

林清玄：玻璃心

在一所中学演讲时，有一个学生问了个问题：“你认为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认为人最大的危机是越来越不像人。”“为什么？”“因为人的品质日渐低落，越来越多的人像动物一样，充满了欲望，只追求物质的实现与满足。而人在生活形式上则越来越像机器，由于和机器相处的时间日渐增加，甚至超过人与人相处的时间，人在无形中受到机器影响，人味比从前淡薄了。”我说。

那位中学生听了，又站起来问：“那么，你觉得人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我说：“人最大的希望是单纯的心、奉献的心、爱人的心。”“所谓单纯的心就是不功利、没有杂染的心；奉献的心就是时常渴望为别人做些什么，带给别人利益；爱人的心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发自内心地关怀别人。如果有这些心，人就会比较有希望了。”我补充道。

另一位看起来很活泼的女生站起来，俏皮地说：“可是杨林有一首歌叫《玻璃心》，说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很容易破碎的！”说完后，大家哄堂大笑，我也结束了这一次演讲。

在往台北的火车上，回想着这段对话，我觉得自己的答复有一些是需要补充的。最近这些年，我感觉越来越多的人有两极化的倾向。一种是生活、行为、动机、人生目标极像动物，就是我们所说的“衣冠禽兽”，他们几乎不管心灵的提升，只求物质的满足，还有一些是不在乎别人死活，杀盗淫妄无所不为。另一种则是极像机器人，全部自动化，终日不与人相处，只与机器相处，在家里一切都是机器化，出门关在汽车里，在办公室则与电话、电脑、传真机为伍，晚上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到睡去为止。

这种两极化的倾向是非常令人忧心的，人间的冷漠无情、僵硬无义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因为不管是“衣冠禽兽”或“衣冠机器人”，共同特质都是缺乏人间的沟通与情义。时日既久，当然成为人最大的危机了。

要突破禽兽与机器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有一颗温暖的心，过单纯的生活，真实地为别人奉献，花更多的时间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机器身上，其实这也只不过是坚持作为人追求真、善、美的品质罢了。

确实，做一个完整的人比做禽兽复杂得多，与人沟通相爱比和机器相处困难得多，使大部分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不肯承担人的责任与荣誉。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倾向动物或机器人的人，都是曾受过伤害和害怕受伤害的人。

可是，有一颗容易受伤害的玻璃心，总比没有心要好得多，偶尔听听心灵破碎的声音也比只想贪求世界便宜的人要可爱得多。

有时候极让人痛心的是，人类文明的推动发展，到最后竟使我们在流失人的品质。我们借着电脑、电话、传真机沟通，而懒于互相谈话、拥抱、互爱；我们看一幅画的好坏先看其标价；我们交朋友先衡量互相的价值，以便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到最后，许多人竟无视别人的死活，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被捕了还在电视上微笑。天啊！动物相互之间都还有哀矜与关爱之情，机器都有无误守信主义，人为什么沦落至此。

人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而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要大家一起来反制这种危机。用玻璃的心、水晶的心、钻石的心、黄金的心都好，不管是什么心，只要有心就好！（《教育文摘周报》）

《教育》杂志编委会（均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主编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编委会（按姓名字母排序）

陈十一 北京大学副校长
甘中学 新奥集团首席技术官
黄晓庆 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
季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讲席教授、系主任
李东升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院长
李献国 天津大学绿色能量研究所所长
刘佳炎 创斯达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军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科 环球资源公司(UGR)合伙人
潘海东 互动在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王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许嘉森 广州益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袁弋非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张丹 方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辉 北京创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界文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
邹鸿生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教授

出品人

周怀北 尔湾文化传播创始人
武汉大学教授

策划编辑

王锋琪 李艳琴 刘玉琴

美术编辑

张敏

法律顾问

李瑞

运营推广

余紫娟

编辑事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B座14层07室

邮箱：editor@creativedu.org

网址：www.1000thinktank.com/jyzz

※ 杂志转载了部分网络文章，如作者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与编辑部联系相关事宜。



P.11

封面报道 Cover Story

师道尊严：新时代的教育之根

教育至关重要的是什么？是调整学生的人格结构，具体地说，就是培养他们成为一个新型的“三好学生”：身体健康(physically fit)，专业扎实 professionally proficient)，情感正常 (Emotionally sane)。

教学的目的，除了讲授谋生技能，更要通过一点一滴的言行，调顺性情，让抑郁的同学渐渐开朗，让理性之光洞穿沉闷的阴霾。我们要教会学生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热爱生活本身——爱生。“学生”的本意是学会“生”，或者生活，把自己的人格结构调整成为一个爱生型的人格结构，做一个精神自由的人，行为自发的人，情感自由流露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尽量不要异化，成为权威的附庸、时尚的奴隶、流行的追随者。

P.04

新闻汇 News

- 04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否认“高校转型说”
- 04 调查显示：国企成毕业生首选 互联网企业成新宠
- 04 香港被评为亚洲最佳留学城市 巴黎蝉联全球冠军
- 05 教育部：确保上下学交通安全 严禁校车超速超载
- 05 2014 年度汉字：“涨、振、困”等上榜
- 05 新丝绸之路教育联盟成立

P.06

名人堂 Hall of Fame

- 06 钱理群：因自由而忧伤，因智慧而美丽
- 09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当校长

P.13

封面报道 Cover Story

- 12 我们应该如何当教师
- 14 教师不应约束人性而是弘扬人性
- 16 “没有问题”是严重的问题
- 18 一个中学老师的“教育家梦”
- 20 加州公立小学老师包班制观察记

P.22

教育广角 Education Report

· 教师观察 ·

- 22 林海音：萝卜干的滋味
- 24 我的老师

· 学生视角 ·

- 26 在香港读大学
- 28 美国孩子们的权力游戏
- 30 食物是童年所有的梦想

· 家庭教育 ·

- 32 我是世界“首富”的穷儿子
- 34 菜虫虫不想 7 岁
- 36 对付熊孩子的招式不只是逃避

P.40

@ 世界 Micro Blog

- 38 微声音

P.42

观点 Outlook

- 40 美国为什么没有 985 或 211 大学？
- 42 我的心一点也不老
- 44 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
- 45 筷子拿得远的人

P.50

悦读记 Reading

- 46 本期推荐：《小熊维尼》
- 47 书评
- 48 书摘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



国际教育网

<http://www.gjjy.com>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否认“高校转型说”

关于今年以来社会高度关注的“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说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首次给予回应说：“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破解以往区域高等教育趋同发展、与社会多样化需求不相适应的难题中早就做了，且做得好好的，还往哪边转？地方高校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做得好的坚持下去成绩会更大。”张大良说。

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各级各类高校就学总人数达到3460万。其中有部分省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由大众化阶段开始进入普及化阶段。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地方高校办学的首要使命和根本任务。”张大良表示，地方高校必须彰显“地方性”这个特征，想地方之所急，做地方之所需，全方位开展好教育、科技、文化、信息、咨政和志愿服务，才能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拓宽高校办学空间，实现地方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张司长指出，学科专业是办学的基本要素与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地方高校要认识并坚持好两个原则：一是对现有的学科专业格局，坚持存量调整。设置学科专业不在多、不在全，而在于优、在于特、在于强。

二是在新设置学科专业时坚持增量优化。地方高校要紧紧密结合地方需要，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人才需求，打造一批地方和行业急需、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

调查显示：国企成毕业生首选 互联网企业成新宠

本科毕业生找工作的战役早在今年9月就开始打响了。这一届本科毕业生多出生于1993年前后，作为名副其实的90后，他们在选择就业时，哪类企业会备受青睐？

近日，人人网对这一届毕业生就业选择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国企仍是毕业生的首选，而互联网企业、创业成新宠，跨国企业的光环正在褪色。参与本次调查的大学生共计2306名，其中男生1137名，女生1169名。

该调查显示，在大学生就业的企业类型选择上，国企占比最多，占大学生比例的27.6%；紧随其后的是外企，占比24.3%；大型民企排在第三位，占比22.8%；合资企业占比17.9%，排第四；其他占比7.4%。

近年来，也有很多国企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发展势头很好。90后大学生更倾向去金融、地产、电力、通信、电子、交通、石油石化等热门行业，譬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等一些知名企业受到90后毕业生更多关注。相比之下，纺织、真空泵等传统行业的国企则少有90后的问津。

就在毕业生忙着投简历时，9月19日，成立15年的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正式进行IPO，马云那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振奋了不少年轻人。

上述调查显示，在大四第一学期，进行创业尝试的同学占11.8%，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李轻侯分析，“创业，是一些毕业生的又一选择。”

香港被评为亚洲最佳留学城市 巴黎蝉联全球冠军

近日，QS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最新排名公布。根据最新排名，香港击败去年位于亚洲榜首的新加坡，成为今年亚洲最佳留学城市。在全球排名中，香港由第七名上升至第五名。另外，其他亚洲城市中，日本东京排名第七，韩国首尔排名第十。而中国大陆有两个城市进入排名，分别为北京(第二十六名)以及上海(第三十二名)。总体情况来看，亚洲共有9个城市进入排名。

据悉，QS发布的排行榜将各城市内学生的组成、城市适宜居住程度、雇主印象、生活指数，评估各城市适合留学的程度。而能够参与评选的城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必须至少有25万人口，以及至少有两所院校位列QS世界大学排名。

根据排名，香港宜居程度称冠亚洲，雇主对香港的大学毕业生评价理想，但香港的生活指数太高，住房租金高昂。虽然香港在总分和多项指标的评分都比去年低，但因为这次排名加入社会安全、污染程度、廉洁等新评分指标，使得香港排名不降反升。

反观香港八大名校，优势专业各有侧重。香港大学的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社会科学专业；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学专业；香港科技大学的工商管理、生物和数学等专业；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学、服装及纺织学专业；香港城市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计量金融专业；香港浸会大学的视觉艺术、新闻传媒专业；香港岭南大学的社科类、工商类专业。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

四川在线

<http://www.scol.com.cn>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

教育部：确保上下学交通安全 严禁校车超速超载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近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加强冬季学校安全工作。通知强调，努力确保上下学交通安全，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逐校逐园逐生对上下学乘车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了解。重点对租用的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严禁出现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逆向超车、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通知要求努力确保上下学交通安全。冬季雨雪天气易造成路面结冰湿滑，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逐校逐园逐生对上下学乘车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了解。要加强校车驾驶人和随车照管人员的教育管理，要做好校车的维修保养，确保车辆处于良好状态。重点对租用的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严禁出现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逆向超车、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在加强消防安全方面，通知指出，冬季天气干燥，是火灾高发季节，各地要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隐患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治。要确保消防设施设备保持良好状态，在发生火灾时能够切实发挥作用。要加强对锅炉等特种设备的定期检查，确保设备运转正常。要加强实验室、楼道等集中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区域的消防管理工作。

通知称，请各地各校务必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明确任务要求，强化责任追究，狠抓工作落实，坚决做好冬季学校安全工作，确保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尽全力避免恶性事故发生。

2014年度汉字：“涨、振、困”等上榜

2014年仅剩月余，哪一个汉字能代表你即将逝去的2014年？即日起，根据天府早报发起的2014年度汉字评选，以一字聚焦社会热点和世态民情，记录转型中的复杂中国。

“振”：《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表示，相较过去，自己的生活工作更加随性。在宏观的国家层面，“2014年如果用一个字来代表，我觉得应该是‘振奋’的‘振’字。这一年给人的感觉就是‘振奋感’，2014年我们国家的形象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都有很大改变，反贪力度的增大，也让老百姓有振奋之感。整个社会精神为之一振。”郝铭鉴说。

“盼”：对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来讲：“2014年用一个字概括的话，我愿意用‘盼’字。我希望在宪政方面有所进步。这是当前中国的关键问题。”茅于軾进一步解释，“强调依法治国，做得不错。还要努力的是言论自由的空间要放开。”对于茅于軾本人的2014年，他表示过得很好，“我在2014年中过得很好。身体也还可以。但是越来越老，这是自然规律，也很正常。”

“困”：对于2014年的年度汉字，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就教育领域来说，我觉得是‘困境’的‘困’字。在我看来，2014年教育领域的发展跟之前是差不多的，发展并不太明显。之所以用‘困’字，是因为我觉得教育还处在困境之中，没有找到出路，或者说找到了道路但是举步维艰。整个教育发展还处在一种‘困’的状态。”

新丝绸之路教育联盟成立

2014年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在成都落幕。年会期间，由亚洲教育论坛秘书处、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和韩国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共同发起倡议的“新丝绸之路教育联盟”正式成立。据介绍，“新丝绸之路教育联盟”旨在加深东西方的相互认知，未来的成员将包括东起亚洲、西至欧洲的与丝绸之路有所关联的6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00多家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的融合，而‘新丝绸之路教育联盟’的成立将促进东西方人才的交流。”韩国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副院长韩君表示，目前“新丝绸之路教育联盟”已获得包括国际商学院联盟、伊斯兰世界教育联盟、亚洲教育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在内的多家综合机构以及哈萨克斯坦、芬兰、以色列、瑞士、德国、捷克等教育界同仁的积极响应。韩君表示，联盟成立后将每年在中国召开“新丝绸之路教育论坛”，不定期地在各个国家召开分论坛。同时，联盟还将编写《新丝绸之路竞争力报告书》。

在当日闭幕式上，由亚洲教育论坛、日本幼教协会、新加坡幼儿教育协会、加拿大约克大学共同倡议和发起的亚太早教发展联盟亦宣告成立。据悉，本届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以“教育·社会·创新”为主题，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以色列、尼泊尔、韩国等600余名政府官员围绕“传统文化继承与教材建设”、“国际合作与民办教育新格局”等六个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钱理群

钱理群，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钱理群：因自由而忧伤，因智慧而美丽

“对于少年钱理群来说，梦是‘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对于成年后的钱理群来说，梦更是‘精神的自由’与‘生命的自由’”。

文 / 谿小语

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1948年的9月25日，《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的文章：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中大附小钱理群。谈到这篇文章时，钱理群说：“我这个人经常

做梦，很喜欢做梦。”这是上小学五年级的他发表的人生第一篇作品，他说：

“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

对于少年钱理群来说，梦是“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对于成年后的钱理群来说，梦更是“精神的自由”与“生命的自由”。他多次跟他北大的学生说：“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

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

学人的梦

提到钱理群，大多数文学青年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鲁迅研究。这的确是他几十年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钱理群生于1939年，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省安顺地区，先后在安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执教18年。



“既要介入政治，又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不看别人脸色说话，只说自己的话。”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知识分子，是“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



时代上的。鲁迅，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反省与批判，知识分子，现代性，精神界战士……这便是钱理群经由文学进入社会与时代的反思的路径。

2014年新年伊始，漓江出版社推出了一本自传性随笔集——《我的家庭回忆录》。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对自己的几位至亲的回忆，它的意义正如钱理群对于周氏兄弟和曹禺的研究——“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因为钱氏家族成员的命运在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性和代表性。1939年1月30日，钱理群生于重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家庭，是钱家最小的孩子。父亲钱天鹤是中国农学先驱，曾主持全国农业工作先后达15年之久，赴台后对台湾与金门农业的振兴贡献很大，金门民众为其立碑纪念。1972年钱天鹤去世并葬于台湾，墓碑由蒋中正题字。大哥钱宁是泥沙专家，三哥随父亲参加了国民党，1949年父亲带着两个哥哥去了台湾，三哥则卒于美国旧金山。钱理群跟着他坚韧而伟大的母亲定居南京，一家人从此隔海相望，再无团聚之日。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二姐、二姐夫和四哥还是老红军、老新四军和地下党员。

“我的家庭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远离治学18年，并且在那个政治主导一切的特殊时代对这个国家与自己的未来毫无预知，这该是一种怎样的苦痛与淬炼？因此钱理群说自己是带着“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的矛盾，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1978年恢复高考时，39岁的钱理群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这样的经历给钱理群带来了一系列尴尬：他要比他的研究生同学大十来岁，他的研究生老师是他大学同学；当他和青年学者黄子平、陈平原一起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被认为是青年学者，可不久人们发现这个“青年学者”实际是一位“老教授”，他也因此受到了来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个方面的批评——这是一位没有自己时代的孤独者。

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到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晓东合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从1998年出版回顾文学史重大变革前夜的《1948：天地玄黄》，到2000年全面总结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我们可以看到钱理群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坚定与执着。

个案研究是钱理群先生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试图通过对鲁迅、周作人、曹禺等现代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和思想的挖掘，总结20世纪文学浸透血泪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而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统一的历史考察，即“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

1987年8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

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1年后的1998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钱理群与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对该书的修订幅度很大，部分章节甚至是重写。因此有人说“修订”既可以看作是钱理群等人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进行文学史写作实验的努力与破产，又可以看作是他们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反省和变通。对此，钱理群在后来出版的《生命的沉湖》一书中首篇即选入《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一文。

在这篇文章里，钱理群说：“今天回过头来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我仍然认为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也还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联系我自己当时的基本思想倾向与追求，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念，今天看来，当时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理解分析，又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更多的恐怕是我个人的。”钱理群由此展开了对现代文学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只说自己想说、又能够说的话，对虽然想说、却一时说不了的话，不妨暂时悬置起来——因此，我对当年对‘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倡导并不后悔，那是迟早要解决的课题，只是现在我不愿也无力多谈罢了。”

思想者的忧伤

无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与反思，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版与修订，无论是对精神偶像鲁迅以至周氏兄弟“心灵的探寻”，还是对“大多数”知识分子代表曹禺的研究，都是钱理群“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切入点，他的目光最终是要落在

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钱理群说。在钱理群这个家中最小的弟弟、一名无党派知识分子看来，国共两党的分裂“一直影响到家庭内部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尽管父兄辈的不同道路都有令他十分敬佩之处，但至亲的殊途给钱理群带来的还有极大困扰与苦难。

就在他14岁时，心目中和蔼可亲、朝思暮想的父亲突然变成了“反动派”，作为“黑子弟”自己必须“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他亲手烧掉父亲的照片。他回忆，“我违心地‘坦白交待’、胡说一气时，我深爱过的学生，我关心备至的学生在疏离我，他们甚至在一个黑夜将一件我送给他们的衣服还了回来，还在上面狠狠戳了几个大洞，写着：钱理群，我们要戳穿你的假面具。”此后的经历不用赘言，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懂的。令钱理群欣慰的是，钱家“第三代对老一辈还是很自豪的，对先辈的故事有一定兴趣”。

在这些疑问中，钱理群常常产生种种“矛盾与困惑”。这种矛盾与困惑进而引发出来的是他关于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的拷问以及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反思。“既要介入政治，又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不看别人脸色说话，只说自己的话。”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知识分子，是“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

这也是钱理群对自己在“文革”后所面临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战士”的关系的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在实践的过程中，这样的矛盾也依然存在，他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骚动与不安。“我们只能在不断挣扎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而且是冷暖自知。”钱理群说。

教育家的情怀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立人’的目标：物质的富裕与国家的富强，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为前提；如果相反，以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物质富裕、国家富强，人依然没有摆脱精神奴役的状态，这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这是钱理群在《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国》一文中写下的话。

知识分子的自觉精神和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使他对“立人”这样的课题格外关注。正如本文开篇所讲，钱先生曾说他自己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当教师也是他的梦。

1960年，21岁的钱理群从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人民大学被派往贵州某中专担任语文教员，直到18年后考回北大。有人问他：“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钱理群回答：“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你可以先把这个回答理解为一种语言智慧，但我们只需看看他在贵州和北大从教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相信他说的确是实话。

1981年钱理群在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又被“最难伺候”的北大学子拥戴为“最受欢迎的教师”。

据说他讲课时全神贯注，气势磅礴，以至于下课时“大汗淋漓，头冒蒸汽，瘫倒椅上”。学生评价他“很可爱”，他自己对此也认可：“已经不止一次听见学生说我‘可爱’了——坦白地说，在对我的各种评价中，这是我最喜欢、最珍视的，我甚至希望将来在我

的墓碑上就写上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

无论是在偏远之地的中专，还是在一国之都的名校，钱理群都被学生认定为“最受欢迎”，如若没有对教育事业极深的感情是无法做到的。几十年间，钱理群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农村教育、打工子弟教育以及教师工作研究等诸多教育问题的文章。

为什么对教育事业有如此之爱之深？在钱理群看来，“生命”与“立人”是教育的两个关键词，他说：“教育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大谈理想的背后所隐含的对于年轻一代生命的关注，对民族未来的焦虑，也是我不想掩饰的。”

2002年3月至6月，这位北京大学资深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之一的人文学者在北大讲坛上了他最后一门课——“我的回顾与反思”。这是一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课程，他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的大问题与大困境，表达一代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

在回顾与反思中，钱理群坦然面对几十年间自己获得的褒奖与荣誉，对其所遭遇的坎坷与打击更是一笑了之。他说：“一方面是对我的咒骂声不绝于耳，一方面却在进行美妙无比的精神对话；头顶着吓人的罪名和随时都会落下的惩罚的利剑，内心却充溢着对孩子、对民族和人类未来的爱；自然时节正当酷暑，却吹拂着阵阵政治的冷风，而自我灵魂深处又分明洋溢着盎然的春意。”（中国周刊）



蔡元培

蔡元培（1848—1940）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1]。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当校长

“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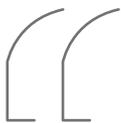
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

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

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



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



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该校与他校的界线，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

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本文选自《北大旧事》，原题为《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师道尊严：新时代的教育之根

要谈尊师重教，首先就要谈师道尊严。因为“尊师”与挚爱学生、“重教”与教育公平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一位教师，若失去了师道尊严，就不会受人尊敬与爱戴。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恶其师，疏其道”。

以此来衡量，如今的老师，不管社会多么浮躁，物质浪潮多么喧嚣，仍要秉持教育理想，尊重教书育人信仰；仍要以身示范，坚守良好的师德；仍要发扬师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地公平对待每一名学生。

今日的师德水准，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本期《教育》将聚焦新时代的师道尊严内涵，以中外名家的中肯分享，希冀为传播教育之美提供另一种视角。

我们应该如何当教师？

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

文 / 叶圣陶

我 现在不当教师。如果当教师的话，我想把以下的话告诉自己，策励自己。这无非“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旨。“以前种种”是过去了，追不回来的了；惭愧是徒然，悔恨也无补于事；愿它过去吧，像一个不愉快的恶梦一样。

如何当小学教师？

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忠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真心愿意作他们的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作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

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往粗浅的方面说，“养成



我能够肯定地说我就是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我比学生，不过年纪长一点，经验多一点罢了。



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回两回，而不能终生以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

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养成，决不马虎了事。这种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

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

我还要作小朋友的家属的朋友，对他们的亲切与忠诚，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小朋友在家庭里，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们往东，家属却要他们往西，我教他们这样，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他们必将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作家属的亲切真诚的朋友，我想并不难；拿出真心来，从行为、言语、态度上表示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谁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

如何当中学老师？

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样。这里我不敢用一个“教”字。因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完整的本领，双手授予学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我能够肯定地说我就是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我比学生，不过年纪长一点，经验多一点罢了。所以，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

我不想把“忠”、“孝”、“仁”、“爱”等等抽象道德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毫无用处，与教授“蛋白质”、“脂肪质”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样。为要使学生的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毫不勉强，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件事情上，使学生养成好习惯。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养成学生的好习惯，综合起来，他们便实做了“忠”字。

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为什么要如此？无非实做两句老话，叫做“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必须“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出愿望来，吐露出话语来，才有真气、才有力量，人家也易于受感动。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匙。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成为推进国家民族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近抽象，可是很重要。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决不专作讲解的工作，从跑进教室开始，直到下课铃响，只是念一句讲一句。我想，就是国文课，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求知文章的意义，揣摩文章的法则。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必须单枪匹马，无所依傍才行。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给他们读解书报。

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我要教他们试读、试讲、试做探讨、试做实习，做许多的工作，比仅仅听讲多得多；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我决不滔滔汨汨地一口气讲给他们听。他们尝试过了，我才讲。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讲书，我只是给他们纠正！给他们补充，替他们分析或综合。

如何当大学老师？

我如果当大学教师，还是不将我

的行业叫做“教书”。我开一门课程，不但把我的一点儿给与他们，还要训导他们、帮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惟有如此，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明日超过今日。这就不是“教书”了。若有人问我这叫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为学”。

我不想用禁遏的办法，板起脸来对学生说，什么思想不许接触，什么书籍不许阅读。不许接触，偏要接触，不许阅读，偏要阅读，这是人之常情，尤其在青年。禁遏终于不能禁遏，何必多此一举？并且，大学里的工夫既是“为学”、既是“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材料该是越多越好；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岂不是舍广博而趋狭小？从而得到结论，凡真是要不得的，他们必将会直指其要不得。

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派与我的课程，假定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似乎没有关系，可是谁影响他的确没有关系？

我这是不忘记“教育”那个总目标；无论我教什么课程，总得对那个总目标负责。假定我的课程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我决不作如是想：教了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之外，再没有我的事儿了，我不妨纵情任意，或去嫖妓，或去赌博，或作其他不正当的事。我要勉为健全的公民，本来不该作这些事；我要作为合格的大学教授，尤其不该作这些事。(教育思想网)

叶圣陶(1894~1988)，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教师不应约束人性而是弘扬人性

老师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学生发展的关键十字路口，我们作为过来人碰巧正好站在那里。

文 / 潘家云

八年前我很怕上讲台，一想到站上讲台没有什么好讲的就莫名其妙地流冷汗，晚上做恶梦。我后来翻到自己当时用的大学英语课本，基本没有什么批注，说明当时备课既不认真也不仔细，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备课、备些什么，为谁备课，完全等着上课时凭小聪明混日子。刚刚毕业，水平本来就欠高，教学态度还不认真，还不兢兢业业，难怪要流那么多冷汗来弥补。

多年的临场发挥、误人子弟让我练出了胆量，也体悟出一个道理：太年轻了不要当老师，自己受罪别人受累。等自己积累了相当的人生阅历和知识，成为一个比较老道的过来人时候，就比较适合当老师了。教师是个不错的职业，非常有意义。老师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学生发展的关键十字路口，我们作为过来人碰巧正好站在那里。

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能够在部分学生的情感世界和认知发展的关键时刻上留下痕迹，并且较长时间地停留在他们的鲜活记忆中。

教育至关重要的是什么？是调整学生的人格结构，具体地说，就是培



如果我们能在传授技能的同时，让同学们感到快乐，不就已经完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了么？智力的快乐应该是快乐中比较高级纯净的一种。



养他们成为一个新型的“三好学生”：身体健康(physically fit)，专业扎实(professionally proficient)，情感正常(Emotionally sane)。情感正常实际上比其他更为重要，用大卫科波菲尔里的

母亲说，一颗有爱的心比任何智慧都重要。

我发现，真正的健康人格极少，绝大部分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性格畸形的程度不等，所以才会产生不同强度

的偏见。

实际上，塑造一个健康人生的人格结构比任何学识都重要。自我的独特性何在？我们实际上在任何方面都很难出色的，我们的意识形态早就被权力、历史、文化、政权解构了又重构，就像硬盘一次又一次地被格式化，简单说，我们所说的每句话，都是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控制后的具体发音。我们并无思想方面的独特性。我们的真正的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自我的物质性、灵魂的独特性、人际关系的独特性。

教学的目的，除了讲授谋生技能，更要通过一点一滴的言行，调顺性情，让抑郁的同学渐渐开朗，让理性之光洞穿沉闷的阴霾。我们要教会学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热爱生活本身——爱生。

“学生”的本意是学会“生”，或者生活，不是学死、学会毁灭，把自己的人格结构调整成为一个爱生型的人格结构，做一个精神自由的人，行为自发的人，情感自由流露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尽量不要异化，成为权威的附庸、时尚的奴隶、流行的追随者。总之要把把握好“度”，不要过分。

看完纪录片《辛亥革命》之后，笔者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狂飙似的暴力革命之后，不能忽略了和风细雨的、渐进的革命：对大众的和风细雨的教育，使人人都掌握一项谋生的技能，从而通过经济独立过渡到人格独立和精神独立。如果我们能在传授技能的同时，让同学们感到快乐，不就已经完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了么？智力的快乐应该是快乐中比较高级纯净的一种。

我觉得教育的目的之二在于改良人的心理现实。教育实际上是服务业，特别是人文学科，什么物质环境也改变不了，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人的心理取

向，消除潜在的破坏行为，改良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在艰难或者单调的环境中也能自得其乐。一个教师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很多人的心理健康。

所以，做老师，最要紧的是不要打击学生对人生的信心。我们只是早生几年，多活几岁，先走几步而已。千万不可用自己年龄的优势来打击他们对知识的信心。你欺我小，我欺你老，千万不可让报复心理一代一代地恶性循环。

我们要做一把火把，照亮他们还没有发现的科学和艺术的快乐，帮助他人发现他们的独特的潜能，帮助他人成为他的理想的自我，帮助他们获得意志的自由，而不是去用强力打造他成为我们需要的形状。

教书的意义之三是教育的回报不不仅是相对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业本身的独立性。三尺讲台，有多少才华都可以充分展示。只要一走进教室，每个老师都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单兵，都要独自面对一屋子的人。我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征服下面那群目光炯炯的人。

所以，这个职业有相当的挑战性、独立性、自主性。具有顺从型性格的人是不适合当教师的，他不知道如何特立独行，而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看重的就是这种充分发挥自我潜能的自由。

其他的职业诸如公务员之类，除了日常工作非常琐碎无聊之外，还要看上级的脸色做事，不仅劳动力的使用方式没有自由，精神也没有自由。教师的工作性质类似于艺术家的创作和科学家的研究，它不约束人性而是弘扬人性，它是创造性地消耗自身的能量，它不仅创造性地解决知识点的传授问题，还可以让我们有时间继续学习，创造性地解决一些人性和心理问题。

教育是整个民族的升级软件。教育好不好，牵涉到整个民族升级的程度不高。教师好不好，可以影响到上百人的心理生活。

2005年5月6日《纽约时报》的七天内被转发最多的文章是THOMASL. FRIEDMAN谈论教育的，他建议的最好的学习方式是，问周围的同学谁是最好的老师，然后去听他们的课，不管什么课都去。

多年之后，你也许忘记了具体的知识点，但还记得那种被激发起来的求知的激动和乐趣，热爱求知就是好老师给你的影响。

教学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好处就是有机会说话。据说每人每天必须说五千个字才能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说话的确可以保持心理健康，让人想法单纯，情绪正常，能言善辩，更有甚者，不说话就会难受，一打开话匣子，就能够自得其乐，活脱脱的语言欣快症(speecheuphoria)!难道各位没有看见公园里很多免费为陌生人做演说的人么?他们不是在兜售自己的思想，而是无聊得必须找人说话。所以才不管认不认识，张开嘴巴就是许多串“思想”。真正有思想的认恐怕不会如此不看场合吧!上课是对一个人冥思苦想的强迫打断，免得偏执的思绪走火入魔。对于英语老师则更好，上课就像去英语角，不仅英语越练越好，而且还有人付给你钱，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教育的目的是热爱生命、热爱独立和自由，热爱求知和智慧，是激发起我们内心中某种持久的热情来对抗生活的单调无聊和烦闷。(共识网)

潘家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没有问题”是严重的问题

时下中小学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不重视培养学生怀疑与批判思维，相当多的教育工作者对教学中的“怀疑与批判思维”缺乏认识。

文/吴非

多次听到这样的描述：学生带着问题来上课，下课时，他的问题解决了。——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作“教学”。教学传授知识和能力，教学能解决学生的困惑，教学能把孩子们从不会教到“会”……人们这样认识教育教学，同时，他们用考试成绩来证明所受到的教育是成功的；在平时，家长会自信地认为“我的孩子学习没有问题”。

我的经历告诉我，不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小学生守则》上有一句“上课专心听讲”。我后来明白，之所以有这一条，是因为有很多同学上课“不专心听讲”。他们为什么不专心听讲？

直到我也开始不专心听讲时，才感到麻烦了：因为老师讲的我不需要听了，因为老师所讲的解决不了我的困惑。我在课堂上表示不理解或“我不知道”时，老师会冷冷地要我坐下。我不是调皮捣乱的学生，我真的是有了疑惑，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刨根问底，而仅仅想让老师认为“我在想”是正常的，然而，一些教师已经表示不耐烦。

文革后，我上大学，有些同学经



如果我们的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发现并提出问题，不能抒发个人见解，那样的教学又能有什么价值？那样的课堂谁会怀念？



历大劫，可能开始觉醒，我们多次在课堂上质疑教师讲授的内容。有意思的是，个别教师会停下来，认真听取我们的提问，肯定我们的质疑。

文艺理论课上，教师举例批判肖

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说索科洛夫被俘后，在集中营里，当德国军官把面包香肠赏赐给他后，他回到营房，和其他战俘“像狗一样地”分了吃了。

“这哪里像我们《红灯记》里的李玉

和，赴宴斗鹁山，硬是不喝敌人的一杯酒……”他举这个例子时，课堂上一些同学很兴奋，认为老师“立场鲜明斗志昂”。

我则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班上绝大部分同学根本没有读过那篇苏联小说。分组讨论时，老师问到我，我很诚恳地说起少年时代读这篇小说的体会，特别谈到经过文革的磨难，我个人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我认为对九死一生的爱国士兵索科洛夫的作那样的批判是毫无道理的，应当憎恨的是法西斯；同时，我也直言对“样板戏”逻辑的厌恶。我平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同学们面面相觑，担心老师生气。老师专注地听完我的发言，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你读过这篇小说，有自己的思考。但是，在目前，我只能这样讲。”——他这句话一直令我难忘，其潜台词可能是：“其实你的观点是对的”，“我也不想这样讲，但我没办法”，“我的课堂我作不了主”……

30多年过去，偶尔会面，那位老师还能认出我来，我怀疑可能还是因为那个“在目前，我只能这样讲”的记忆。只是他做了高官，仍然会言不由衷。

我因此有所叹。我们做教师的，如果不能在课堂上说心里话，我们的学生怎么可能成为有正常思维的人？同样，我想到，如果我们的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发现并提出问题，不能抒发个人见解，那样的教学又能有什么价值？那样的课堂谁会怀念？

时下中小学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不重视培养学生怀疑与批判思维，相当多的教育工作者对教学中的“怀疑与批判思维”缺乏认识；他们甚至反对这个提法，为了能轻松顺利地灌输，让学生“听话”与“服从”，让一代又一代的

学生成为“驯服工具”。

在奴化教育下，学生没有积极思维的意识，他们在学习上总是被动地“被提问”，而不能主动地去探究问题的本源。当学习成为强制性的任务，需要用考试来压迫，而不是鼓励探索、获得乐趣时，学生当然只能等待教师的“教”，只能“接受”，只能“被灌输”。我上课时间问学生：“这篇课文都读过了吗？”“读了，”学生齐声回答。“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学生习惯地拖腔拖调，懒洋洋的。“好吧，”我说：“打开下一篇课文。”学生神情惊异地嚷起来了：“还没教呢？怎么就翻过去啦？！”我说：“你们不是说‘没问题’吗？既然没有问题，干嘛要我教？”学生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不讲理”的老师，但他们很快明白，不讲道理不会学习的正是他们。

一个学生在物理和化学课上把各种定理概念背得滚瓜烂熟，离开课堂后却不能用这些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物理和化学现象，连“联系”的意识也没有，“教学”对他的思维没有任何启示，他当然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

如果学生提不出问题，我会认为自己的教学价值有限，我希望学生提出的问题能难倒我，那样我的教学将会有动力，也是有趣的。早些年，我在课上分出一些时间来让学生讨论，我试图通过讨论来让学生发现更多的问题。但我经常很失望，我难得看到有意义的质疑。

教师下了课离开教室，“教学”结束了吗？

没有。教师离开了，但他的课堂表达仍然会留在学生的思维活动中。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启思”与“导疑”，他的学生在下课后带着一堆疑问回家，那

可能才是成功的教学。

每次讲座结束时，都希望老师们能提一些让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很遗憾，常常静场，可能是客气，更多的，是一些老师从学生时代起，接受的就是“没有问题”的教育。为了鼓励教师们提问，我总是要添一句：“我可以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为了不让大家尴尬，我会再加一句：“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会认为今天的讲座很失败。”有时，会有一两位老师勇敢地站起来，问：“我想请您讲一讲今年的高考……”

每听到人们叹息“与诺贝尔奖无缘”，就感到可笑：丧失了个人思维与价值立场的人群，要那个奖有什么用呢？没有批判怀疑和发现能力，又凭什么想要那个奖呢？

链接

吴非谈教师的“问题意识”

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就是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能发现问题，并始终正视问题，重视个人思考的价值。

要有“问题意识”。我是个愿意“相信”的人，但我更加尊重事实，希冀发现真相，这就让我不断地发现周围的问题，从课堂，从教科书，从学生的反应，从检测与考核评价，从学校的教育行为……那些年，我对语文教育产生的疑问，日后都成为我的教学与科研的出发点；由此而生的相应的思考，以及为寻找出路所作的探索，对后来从事的语文教科书编写，乃至树立正确的教育观，都起了重要作用。

吴非，著名杂文作家，特级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中学老师马小平的“教育家梦”

马小平的原则是：教育不是折磨，不是遥不可及的幸福，而是当下的幸福。

文 / 曾鸣

马小平教育师德“干教育这一行，如果不是十分的热爱，干得不愉快，而且还痛苦，那就真正要赶紧改行。但是我们如果执意选择教育，那我们就得朝最好的方面去做。”

喜欢思考，喜欢阅读，是马小平留给同事们的最深的印象。

马小平是个好老师吗？

深圳中学学生李舒扬记得一个细节：家长会结束以后，马老师被很多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上的内容，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后来马老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去到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里泣不成声，非常难过。”

2012年1月16日，名不见经传，却又引起各种争论的深圳中学语文老师马小平，带着他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對教育事業的一腔赤誠，離開了這個世界。

“要趕在災難尚未毀滅人類之前，把能夠應對這種災難的一代新人給培養出來。”馬小平生前曾多次談到他的教育理念。不知者大概要謂其危言聳聽；知者，如北京大學的錢理群教授，則謂馬小平為所識教師中“最具世界眼



光”，“可以稱得上是教育家”的人。



光”，“可以稱得上是教育家”的人。

教育災難與災難教育

馬小平的理想，源自英國教育學家湯因比的“與災難賽跑”的教育理念。

湯因比認為，人類面臨着“破壞自然環

境”與“戰爭衝突”這兩項災難，而教育是實現自我救贖的唯一途徑。但在現實的教育實踐中，湯因比的教育理念與一名中學語文老師的具體工作，卻又隔得很遠。

在大學，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

成了马小平的偶像，他迷恋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与理念。

在上世纪50年代，苏霍姆林斯基即提出“和谐全面发展”、“要思考，不要死背”、“走进大自然”、“没有‘差生’概念”的口号。这些都被马小平奉为圭臬。而帕夫雷什中学则更是他心中的圣地，他常说，这一辈子，只要能到一所像帕夫雷什中学那样的学校去教书就值了。

1982年，马小平29岁，他回到家乡的湘潭十中，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在“怎么成为一个好老师”这个问题上，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是要多读书——“要读书，要如饥似渴地读书，把读书作为精神的第一需要……”

马小平遵循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导，还组织青年教师一同阅读。4年后当他调任湘潭市一中的时候，藏书已有六千余本，而他向新东家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有一间自己的书房。

在湘潭的十年，是马小平教育思想的形成阶段。1988年，他写下了《关于语文教学及研究的哲学思考》，提出“把语文教学提到一个哲学的高度来认识”。

关于语文教育，马小平认为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而事关人格养成、公民责任以及智慧与情感。

邓白洋是湘潭一中1986级320班的学生，马小平的语文教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回忆，马老师会用初一、初二两年的时间教完三年的课程，初三一整年都用来进行课外阅读，大量讲述鲁迅、卡耐基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而课外，马老师还经常和他们下围棋、国际象棋，打桥牌，打篮球。

邓白洋感慨，“那是真正意义上的

启蒙，我们尚显稚嫩的心灵模模糊糊感知到了诸如自由之思想、平等之精神的概念，开始认识到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追寻意义和价值，知道了自信的重要，以及做自己喜欢的事更能激发潜能。在这些层面，马老师从不直接给我们答案，而只是启发我们的思考。”

“同学们，我把课堂还给你们了”

1992年，马小平开始教育生涯的第二个十年，他来到了东莞中学。这是马小平思想系统化的时期。他开始尝试“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

2002年，马小平来到了深圳中学。在这里，高一、高二通常不会涉猎应试技巧，马小平过了更为如鱼得水的两年。

马小平的原则是：教育不是折磨，不是遥不可及的幸福，而是当下的幸福。在来到深圳中学的第一节课上，他就宣布，“同学们，我把课堂还给你们了。”

学生们回忆，他讲到忘我时，常常连课本都不会去摸一下，而是依靠自己大量的知识储备发挥，和学生们互动，带动学生们跑进思考的草原；甚至，他会让学生们合上书本，在课堂上看电影，听音乐，欣赏诗朗诵。

他不仅成为学生的老师，还成为老师们的老师，王赫、薛安康、王东文等老师表示他们经常收到马小平送来的各种书籍和电影，经常被拉着进行受益匪浅的长聊。

“我一想起马老师就记起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远远地对我招手，然后轻轻地说：来来来。然后马老师就从他肩上取下他永远斜背的背包，一条腿支起来，把包放在腿上，然后就从里面翻出一张碟来问我：哎，这个你有吗？”

马小平唯一没有打动的是病魔。在过去的20年间，他坚持大量阅读和思考，常年睡眠不足，高强度的工作终于反噬了他的健康。2004年，他被查出患有胶质瘤，位于脑部。

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要在最后的时间里留下些什么？马小平又一次想到了“与灾难赛跑的教育”，怎样才能塑造能跑赢灾难的一代新人？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答案，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他回答道：“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

医生发现，病人马小平从不过问自己的病情，而是整天在病床上捣鼓笔记本电脑和扫描仪——马小平从逾千册藏书挑选了一百三十篇文章，按类别分成《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重要》、《公民的诞生》等16个篇章，合编成《人文素养读本》。文章的作者有罗素、爱因斯坦、龙应台、王小波、贺卫方……

2012年1月18日，马小平的追悼会在深圳中学举行。一切仿佛一个普通的教学日。

在马小平30年教师生涯结束的这一刻，几乎每一位致悼词的人都谈到了教育，谈到了课堂上的点点滴滴和诗歌小说的种种细节，对于这个生前将生活和工作缠绕得如此紧密的人来说，这便是归宿吧。（南方周末）

马小平（1956~2012），从事于中国高中语文的教育工作和教学研究，提倡人文教育。

加州公立小学老师包班制观察记

在教室里共存的几位老师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教授”队伍，这样的“教师”队伍，就是让教育铺洒给每位孩子。

文 / 钱欢欣

在上海启动的第6期“影子校长项目”中，我有幸成为19位中小学校长之一赴美考察。那段时间，我们陆续进入Acadia学区的一所高中、Rowland学区的一所初中、一所小幼一体化和一所小学初中一体化的学校，并做了数万字的教育笔记。其中，加州的小学教育实施老师包班制让我充满疑问：在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包班制究竟是怎样的呢？

高年级小助手

来到教室，学生出去活动了，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和两个家长。这个学生看起来就知道不是一年级的学生，但是，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家长和老师在深入的交流，那么这个学生在干什么呢？带着疑惑我和她交谈起来……她回答说，她是七年级学生。她在帮助整理材料，她是老师的助手。

她没有参加班级的体育活动，利用这个时间，帮助一年级老师整理一年级学生作业。我问她这影响你学习吗？她回答，她很乐意。教育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关爱心，这样的话语无需说出口就已经根植于孩子幼小的心灵。帮助别



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这与其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分不开。新加坡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分流制度，又称“精英教育”。



人是一种责任更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学校的学生培养目标有一条就是培养责任感和关爱心，这样的细微活动就是一种目标的具体落实。静下心来反思我们的办学目标都是把学校办成怎样的

学校？而美国更注重学生培养成怎样的人？立足点的差异啊！

名字棒

在课堂上，我突然关注到这样一个

细节，每个老师手里有一个小的笔筒，里面装着每个孩子的名字棒，样子就像冰棒的手柄，上面写着每个孩子的名字，老师上课都会拿。

我很好奇，问及为什么？老师回答，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请过回答问题的同学名字棒会拿出来；第二因为谁开小差，他会把名字棒拿在另一侧，用请他回答问题来代替提醒他，下课后会进行个别交流。在他们的课上Not to punish or reprimand. Not to see who isn't paying attention.。课堂中很小的细节体现了老师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

的确如此，我们的学校主要权利都在老师手中，如果老师偏袒一些，那么只会是举手的同学机会多一些，如果像抽签一般，将机会撒给每位同学，那么这个决定权就是在上帝的手中，那么每位学生都是平等的。

一年级数学课也在上数学加减法，每个学生用塑料纸自制小黑板展示自己的解题成果。用二张塑料纸订起来，中间用一张白纸，用黑色记号笔直接写在夹有白纸的塑料纸上，当老师说举答案时，所有学生举起解题步骤，教师对学生的答案一目了然。

做完后可以用餐巾纸擦掉，然后可以继续后面题目，很环保也很实用，便于老师及时了解学生掌握情况，对课堂及时进行调控。

其实如果IPAD能进课堂的话，学生的答案亦能一目了然地反应在教师的电脑上，那么老师也能第一时间知道错与对，或许高科技亦能带来便捷，但是代价也比较高。

学生违纪告知单

在午饭期间，我来到了教工休息室

用餐。老师们很热情地邀请我坐在他们一起，询问了一些中国学校的情况。正好有一个老师拿了一些黄色纸张过来，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她很热情地用简洁语言告诉我，这个黄色单子是学生违纪单，要交给家长的。

当学生在学校违反校纪校规时，老师会开一张这样的单子，上面写清违反学校哪一条规章制度，如奔跑、讲粗话、打架、没有站在规定线上等。老师开出单子后学生会叫到辅导中心，有专门老师进行教育（小学老师包办制，没有班主任）。老师会告诉他违反了什么制度？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等，等学生认识到错误后让他回班级。最后由老师联系家长，告知情况。如果学生多次拿到Yellow Ticket，他将不能评选每年度的荣誉学生。

一年级老师的一天

加州的小学教育实施老师包班制，没来之前，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在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包班制究竟是怎样的呢？每天早上7:45之前，老师在班级迎接学生和接待家长、准备授课内容，然后课程安排如下：7:45~10:15 语言课；10:15~10:30 操场体育活动；10:30~11:00 数学；11:00~11:30 体育课；11:30~12:00 午餐；12:00~12:20 操场活动；12:20~12:50 结合绘本故事教授2个句型。“I learned.....I wonder.....”老师中午一边准备下午的教具一边啃面包，然后继续下午的课程：12:50~1:30 数学加减法；1:40学生放学，家长进校和老师进行沟通。

看着课程安排，我在感叹他们老师工作精神的同时，也在思考“学生吃好饭就上课，效果如何呢”？

走进教室，最让你惊讶的是美国教室里有几位老师，这是为什么呢？一位是管理班级的老师，每个班级只有一位固定的老师，这个老师负责学生一天的课程，如数学、英语、历史、科学等全部由这位老师来教授，就好比是包班制，一位老师承包了一个班级所有的课程，这需要一位有着百科全书般知识的老师去教授，他不仅要上通天文，还得下知地理。

当然，在美国，教师也是不能随便叫的，必须有硕士学位和教师证，并经过二年实习期后才能真正称为教师，每个学校有几个班级就有几个老师，其他人员统称为staff（工作者）。

工作者包括一位学生和家。每个班级一般都有高年级或者别的班级的学生志愿者。他们在小学期间必须完成一定的志愿者课程，也可以是帮助老师整理书籍、下发资料等杂物工作，每天半小时的服务时间。还有的就是学生家长了。学生家长在班级里帮助老师收邮件、批改作业、照顾特殊学生等，他们把能来学校帮助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在教室里共存的几位老师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教授”队伍，让教育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了算，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操心 and 负责，这样的“教师”队伍，就是让教育铺洒给每位孩子，虽然在国内还是有一些辅读学校但还是区别于正常学校的授课，这里就让每位孩子生活在同一间教室中，享受同等的教育，或许，美国是奉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们以不同的人员，不同的方式组成一个大family去实现教育。

钱欢欣，上海市金山区海棠小学校长，曾获2013年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萝卜干的滋味

这萝卜干到底是什么滋味？它实在是包含着人生的各种滋味，要看什么人在什么境遇下吃它。

文 / 林海音

林老师：

请您原谅一个终日忙于家事的主妇，她以这封信代替了本应亲往拜访的礼貌。

写信的动机是由于小儿振亚饭盒里的一块萝卜干，我简单地讲给您听。

这件事发生已有多久，我不知道，我发现则才有三天。三天前，我初次发现振亚带回的饭盒中有一块萝卜干时，并未惊奇，我以为那是午饭时同学们互尝菜味所交换来的。但当第二天饭盒的残羹中又是干巴巴的萝卜干时，不免使我生疑，因而仔细看了两眼，这才发现垫在萝卜干底下的，是一小堆粗糙的粳米剩饭，我们家向来是吃经过加工碾拣的蓬莱米的，因此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缘故。同时我又发现这个看似相同的铝制饭盒，究竟还有不同之处：我们的饭盒，盒盖边沿曾被我在洗刷时不慎压凹了一小处。这个饭盒连同里面的饭菜，显然不是振亚早晨所带去的。但是我没有对振亚说什么。第三天，就是昨天早上，我装进饭盒里的有一块炸排骨，我有意在等待这事的发展。果然，振亚带回的饭盒中，没有啃剩的骨头，却仍是干瘪的萝卜干。而且奇怪的是，我们自己的饭盒又换回来了。

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有计划的阴谋，有人在干着偷天换日的勾当。这是出于某一个人的行动，他所作所为，无非是想攫取我儿的营养，怎能不教做母亲的我痛心！

林老师，您或许知道，我们并非富有之家，我的丈夫靠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因此在每天给他们父子俩的饭盒里，无论装入的是一块排骨、一个鸡蛋或者一只鸡腿，我都会想到它来之不易。它是为了丈夫的辛勤，儿子的发育，我的节俭，才勉强做到的。所以我不客气地跟您说，我们是禁不起这样被人偷取的。

我也知道，在您的教育之下，是不可能使人相信有这类事发生的，但事实摆在这里，又有什么办法。为了我儿的营养，我只好求您费费心，查明是哪个偷天换日的聪明孩子干的。萝卜干偶尔吃一次是香的，但是天天吃，顿顿吃，您想想是什么滋味。怪不得那个孩子想出这样巧妙的办法，那臭烘烘的萝卜干，他早就吃够了！

为了您调查的方便，我想告诉您，今天早上当着振亚的面，我在饭盒里装进了一个大肉丸，您可以看看，到底是哪个今天要倒霉的孩子在吃这个大肉丸。

敬祝公安

朱夏荔媛 上



虽在如此纷乱丑恶的人间，善良的本性却并未从我们的第二代身上失去，这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情。



林海音，台湾著名作家。曾担任“世界日报”实习记者，主持《联合报》副刊10年。

二

朱太太：

工友送进您的来信时，我刚在饭厅里坐定，四十多个孩子正窸窸窣窣地吃着各人的午饭，我却停箸展读来函。我以怀疑的心情打开您的信，却以快乐的心情读完它，现在我以无比轻松的心情写信给您，同时告诉您，我捉到那“贼”了，您所说的，那个“偷天换日”的聪明孩子被我捉到了。

我先告诉您三天来的情形，再讲我是怎样捉到那小贼的。这里吃饭的情形您或许早已知道，孩子们每天早晨到学校后，便先把各人的饭盒送到厨房去，交给大师傅老赵，他便放进大蒸笼里。午间各人到厨房去取蒸热的饭盒，厨房旁边是一间大饭厅，大家都在那里吃午饭。我也不例外，一向是陪着孩子们一同吃的。

三天前吃午饭时，当我正举箸，刘毅军站了起来，他说：“老师，有人拿错了我的饭盒，这……这不是我的。”我抬头望去，可不是，饭盒打开来，横躺在热腾腾的蓬莱白米饭上的，是一只香喷喷的红烧鸡腿，我知道那确实不会是刘毅军的。我便对同学们说：“是谁拿错了饭盒？是谁带了有鸡腿的饭？”等了几分钟，也没有人来认换。也难怪，饭盒的大小样式几乎都是相同的，而且家里给装了什么菜，孩子们也知道的不多。既然没有人来认领，只好叫刘毅军吃了再说。毅军津津有味地吃着鸡腿，十分高兴。不是我看不起刘毅军，无父的孤儿，靠寡母穿针引线替人缝补度日，如果不是有人拿错了，他哪摸着鸡腿吃呀！

可是第二天，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我也不免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当刘毅军打开饭盒，又惊奇地喊着有人拿错了的时候，同学们都停下筷子围到毅军的面前看。今天换了，是一块炸排骨。我问毅军自己带的是什么菜，他很难为情地说：“只有一些萝卜干，老师！”

我对同学们说：“看看谁拿错了饭盒，炸排骨换萝卜干可不划算！”同学们听了哗然大笑，却仍无人来认领。我虽也觉得有趣好笑，却也不免纳闷儿起来。刘毅军也以想不通的样子吃下了这顿排骨饭。

说到萝卜干，我实在还应当把一些情形说给您听：刘毅军的母亲，在我去做家庭访问的时候，她并不避穷，很坦白地对我说，一日三餐的筹措，是如何艰难，所以，她要我善为教育她的独子毅军。在这一点，毅军倒从未使人失望。当毅军的母亲和我畅谈家常的时候，她家的院子里，正晾着一篮篮的萝卜

干。指着那些被吹满尘土的萝卜片，她对我说：“老师您看，我晾了这许多萝卜，可也不是花钱买来的，附近有一家菜园，种了许多萝卜，当人家收成拔萝卜的时候，我就赶了去，把人家扔掉不要的萝卜头、萝卜根、坏了心的、脱了皮的，统统拾了来。我再挑拣一遍，晒晒腌腌，可以够我们娘儿俩吃些日子的。”

朱太太，您问我萝卜干吃多了是什么滋味，我想毅军的母亲吃着它的时候，当觉其味无限辛酸。就是毅军，在他长大以后，回忆起他嚼萝卜干的童年时代，也该有不少的感触。如果有一天，他能读到明朝三峰主人给他的朋友洪自诚所著《菜根谭》写的序中的“谭以菜根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这几句话时，他会觉出，当年所嚼的萝卜干，实有一种“真味”。

我跟您扯得太远了，让我们再回到饭厅里去。我读完您的信，停箸良久不能自己。我草草吃完饭，顺着饭厅巡视一番。走到那个圆圆红红小脸蛋儿的孩子面前，我停下了，这孩子抬头看见了我，有点做“贼”心虚，急忙用筷子把饭盒里的萝卜干塞到在米米饭底下。我却在他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侧着头在他耳旁悄声问道：“萝卜干的滋味怎么样？”他先是一惊，随后竟装着若无其事地回答我：“很甜，老师！”

很甜！我站起身来，回味着他这句话，想着您的来信，不由得抿嘴笑着走出饭厅，可是身后响起了跑步声，有人跟出来了。“林老师！”我回头站定，是小红圆脸，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老师不要讲出去吧，刘毅军的家里实在很穷，他天天吃白饭配萝卜干，所以……”

我的个子已经很矮，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小男孩还比我低半头，他的胸襟却是如此辽阔无边！写到这儿，您已经全部明了了吧。您要我调查的那个“偷天换日”的孩子，我捉到了，正是令郎朱振亚自己！

我又想，虽在如此纷乱丑恶的人间，善良的本性却并未从我们的第二代身上失去，这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情。我不断地用毛巾擦着，想着，擦了这么久才发现，我没有在擦油嘴，却擦的是眼睛。哟，真奇怪！我原是满心的高兴，为何却流泪？

当您看完了这封信，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呢？您会原谅“偷天换日”的孩子吗？我倒要为您的学生向您求情了！

此复并祝快乐

林海音 上

(教育学堂)



我的老师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文 / 莫言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

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记住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校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就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呢！”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



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30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电脑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于老师教我的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尊敬他。

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

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午饭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

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当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凤凰读书）

相关链接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选自莫言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

在香港读大学

港大的学生一定要有很强的目标，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话，就比较难适应。我们需要思想比较成熟的孩子。

文 / 邢人俨

近年来，香港内地生人数增长迅速，香港高校每次赴内地招生都掀起热潮。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公布数字显示，2013/14学年政府资助大专院校课程的学生总数约有9.2万人，当中内地生人数首次突破1万人，多达11376人，占整体人数12.4%，即每8名学生中便有1人为内地生。

一位放弃内地名校转赴港大的考生说，选择香港是想尝试不一样的教育体制。优秀考生纷纷涌入香港高校，对这些内地学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许多过来人感受良多。

一种经历

如果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Connie看上去跟香港人没有任何区别。来港大读硕士之前，她以2004年上海高考文科前三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大二时，Connie到港大交换过一学期，本科毕业后，她如愿到港大读硕士。在香港，几乎所有高校都是全英文授课，英语是内地学生迈向西方教学模式的第一道门槛。Connie印象最深的就是港大的英文讨论课，10人一组，课上你可以听到各种口音的英语混杂在一起，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很敢说，除了英语，还有各种敏感话题。

Connie将港大的生活形容为“自由、时髦”：半夜会有人来敲门邀请你参加party，跟内地高校12点前断网熄灯不同，香港学生喜欢high到天亮；没有人为你制订学习计划，没有辅导员，甚至没有班级的概念，但又总能联系上导

师得到帮助；在这个大学里，很少有人真正只在学习一件事，连校长都会鼓励学生尽情地玩。

“来香港读书，其实是读一种经历，跟内地完全不同。”Connie说。但并不是每一个内地学生都适合这种经历。2011年，港大只从报考的30名省状元中挑选了11名给予全额奖学金。“我觉得适合港大的学生，要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与自理能力，能独立作决定，有自己的想法，能面对挑战，不能太脆弱。”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说，“在这里，竞争是非常非常大的。港大的学生一定要有很强的目标，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话，就比较难适应。我们需要思想比较成熟的孩子。”

突然镀了金

对于Connie和她的一些内地同学来说，除了优越的教育条件以外，更实际的考虑是，来香港读书背后的高性价比。“去国外读书费用太高，离家又太远，香港就刚好，既可以感受西方的教育模式，又还在华人世界。”

“很多公司的亚洲总部都在香港，这里有很多机会，你很容易能找到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

毕业后，这些内地学生一部分去了国外深造，留下来的人不少进了投行。“即使是北大、复旦毕业的，进投行的都不算多，但在香港读书进投行的就很多，就像突然镀了金一样。”Connie分析原因，一方面香港是世界金融



适合港大的学生，要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与自理能力，能独立作决定，有自己的想法，能面对挑战，不能太脆弱。”



邢人俨，《南方人物周刊》
现任记者。



中心，公司多，需要的人多，机会满天飞；另一方面，香港本地人读大学的很多是直接出国留学。

同样是出国深造，从内地申请和从香港申请也会有不同的待遇。“以香港作为跳板，就能申请到一流大学，因为人家觉得你英语好，接受的又是西方教育模式。”Connie说。

“国外的大学不会在乎学生成绩是不是真的很好，是不是很聪明，他们看重你读书的这个环境，跟他们是一样的，有些规则他们就不需要再教你，你过去直接把知识传授给你就行了。”一位在港读理工科的内地学生说。

国际化视野

2004年，刘宇考入浙大信息工程专业。当时香港理工大学每年都会为浙大招收十名左右的学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刘宇选择了来香港读书。父亲是大学老师，他不停地告诉刘宇，香港的学术环境安静，实验室里的老师做学术专心，没什么行政压力、人事斗争，都是真才实学。

“在香港，确实更容易找到国际化视野。”过去的几年里，刘宇已经在国际顶级行业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这在内地大学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不太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章，因为不是用英文完成的，而我们这里直接是用英语做科研。”根据L-GC的数据，2007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5871个研究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由内地学生获得。

在刘宇看来，香港大学里另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地方就是学术操守。他将这种学术操守理解为，不抄袭、肯定能用、有成效，其中不抄袭是道德底线，肯定能用和有成效是起码要求。

“内地每天工作8小时，香港一天甚至要工作16小时，工程师水平就能超出内地一大截。”

导师也经常灌输给刘宇和他的同学这样一种观念，我给

你这么多钱，就是要你做这么多事。在实验室的经费中，项目和科研的资金全都以人力成本计算，导师和教授的薪酬另外支付，“所以，教授没有经济压力，完全可以专心做事。”

现在，刘宇每月拿1万6的工资，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渐渐不上QQ，也不会在网上关注同学的动态，他觉得跟原来的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他们关注的新闻他也不知道。他的圈子不大，同事、同学、导师、老板，很多人的身份还是重合的。

“香港城市小，圈子也不大，如果你造假了、抄袭了，所有人都会知道，以后你就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

刘宇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期《时代》和《亚洲周刊》，这是他在香港最常阅读的刊物。现在，他经常提到的两个词是“国际化视野”和“独立思考”。

晚上12点，刘宇从实验室里出来，隔壁电脑房里有人在用电子琴练习曲子，经过几处楼梯转角，有人坐在沙发上聊天、讨论，整幢大楼灯火通明，毫无睡意。

两种身份

前几年，刘宇在电梯里很少说普通话，他担心一开口就会暴露“内地过来的”这个事实。他觉得自己和内地学生不太一样，从本科到硕士，接受的是一整套香港教育模式。香港人的思维和视角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他的头脑。

在港大特有的学生宿舍文化里，广东话也是新生融入集体的通行证之一，有学生坦言：“不会讲广东话，可能会被歧视。”

入学后的两个月内，学校里专门开设了广东话课，专门介绍香港，把太平山顶、庙街都逛了个遍。等到学会了广东话，刘宇开始等待7年期限的到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这条理由足以使去香港读书多了一层更深的意味。

而对于刘宇来说，他已经更懂得规划自己的未来。“如果在美国，突然有什么变化，离开超过3个月，至少我手头还有一本香港护照。”刘宇说，他很在意这本可以自由通行的护照。大三时，系里组织去日本游学，全系只有20个名额，靠抽奖决定谁能去，他和另外一个内地生中奖了，最终因为护照问题无法成行。

在他渐渐了解香港社会之后，这种渴望又带有更加微妙的心理。“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假期，本地又没什么可玩，旅行就成了他们度假的方式之一。”（《南方人物周刊》）

美国孩子们的权力游戏

孩子不能一辈子都听家长和老师的。他们长大成人后，应该是一个独立思想的公民，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

文 / 薛涌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了，班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她不时回来讲讲，令我想起了我同龄时的小学生活，也得以把中美的小学作了一番对比。

我们小时候，从一年级起就有班干部，全是老师指定的。老实说，我班里的几个班干部，确实属于好孩子，功课特别出色，不能说老师偏心。但渐渐长大后就不同了。象我这种不争气的“平民百姓”，对“干部”多少有些气，觉得他们就知道巴结老师。中学时更明显，选班干部的标准，主要还是“听话”，而且班干部和一般同学之间都有隔阂。

女儿上学，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班干部。第一年上学前班，老师给全班同学分配任务：有的是把门人，即孩子们排队进教师时，把门打开，等全班进去后再关上；有的是领队，走在第一个，引导全班进入教室。可想而知，孩子们都想当领队，不想当把门人。不过，这些角色，从来是每个人轮流，绝对平等。目的是教育孩子，每个人都要给大家服务，对别人都应该尽责任。这大概也是培养集体精神的第一步吧。

女儿上二年级后，这套把戏没有了。班里照样没有学生干部。不过，人是权力的动物，从小就希望当头头，支配别人。上午有一个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一个年级的孩子在游乐场自由活动，小小的权力角逐就从这里开始了。

女儿班上的一位叫阿利克斯的男孩，组织起

一个虫子俱乐部。女儿喜欢自然，赶快去参加。结果她发现，阿利克斯把自己封为老板，另一个女孩子是副老板，还有一个是老板助理，她则是个普通雇员。女儿是个谦和的人，对此并不太介意，跟着玩了不少时间。俱乐部有种种规矩，比如新成员要考试，即抓一个小虫子，但要好好照顾，不能有任何伤害等等。

不过时间久了，女儿觉得自己总听人指挥，有些不耐烦，就决定退出，发起了一个自然俱乐部，马上招来三个小朋友加入。这次她可神气了。她当老板；她的好朋友尼克当副老板，另外一个叫奥莉维娅的女孩，当老板助理。

当我听说奥莉维娅加入时，心里多少有些吃惊。这孩子我知道，非常聪明，是个典型的孩子王，什么事情都要按自己的主意办，从来不甘居人下。她怎么可能安心当老板助理呢？果然，几天后，俱乐部中的权力就发生了变化。女儿作为老板，定下了规矩，要给手下人评分，根据工作成绩确定职位。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捡树叶、捡垃圾。那个奥莉维娅特别机灵，马上捡了许多，比尼克的成绩好。女儿找到尼克，问是否应该让奥莉维娅当副老板，他当老板助理。尼克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不过过了几天，尼克宣布退出，自己另立一个快乐俱乐部，女儿还答应去参加。

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俱乐部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



和我们班干部的法则不同的是，他们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小伙伴们是否认同。



薛涌，旅美学者，现为波士顿 Suffolk University 历史系助理教授。



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如果最后成了光杆司令，俱乐部就失败了。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儿。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莉维娅，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女儿说，她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她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她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大家凑在一起，当着孩子的面，夸奖孩子作的好事。奥莉维娅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莉维娅组织一个音乐剧，在开始时，她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都能跟上。这显示了她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她的领袖才能。”

我当时听到“领袖才能”一词，心里一惊：七岁这么点一个孩子，谈什么领袖能力？但再一观察学校游乐场上的情况，实际上许多孩子都在为确立自己的领袖位置而努力。和我们班干部的法则不同的是，他们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小伙伴们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象奥莉维娅的母亲这样的家长，平时也潜移默化地鼓励这样的行为。

美国的生机是基层自治，一切事情要靠自己解决。比如你到一些偏远的小镇就会看到：政府是业余的，消防队没有什么经费，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当地的志愿人员，一切组织得井然有序。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制度，而且还有习惯。这种自我组织的习惯，必须从小养成。

我们要培养未来有责任感的公民，就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组织自己，自己评价自己。班干部，三好学生等等，是否都能免

掉？没有这些大人的奖赏，孩子们反而能够懂得如何为自己负责，如何当领袖。毕竟，孩子不能一辈子都听家长和老师的。他们长大成人后，应该是一个独立思想的公民，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我们的教育，应该为他们日后对自己的责任作准备。（教育思想网）

链接

国外父母培养领袖儿童的秘诀

1. 倾听梦想

当孩子们的志向与您对他们未来的设计相左时，请多鼓励子女的梦想，无论在您看来这类梦想何等奇特，因为这种幻想同样需要足够的勇气。

2. 提供机会

领导能力需要靠训练来增强，需要机会去磨练领导艺术。让子女参加运动队、童子军、课外活动小组和其他社区组织，他们将获得待人处世的经验。

3. 充分鼓励

孩子微不足道的成功都是值得您称赞的，这不是意味着用虚假的话哄骗孩子，也不是说您永远不能批评孩子，批评应该跟赞扬教育结合在一起。

4. 多问“假如”

“可能性思维”是领导能力的一个标志，那种对一个难题认真研究并向别人演示如何解决它的孩子多问：“假如我这样做了，会怎么样？”

5. 盯住成功

请说服您的子女多想成功而不去想障碍，自信会成功的人就是能吸引别人跟随自己的人。

6. 学会“3R”

Respect(尊重)、Resourcefulness(机智)、Responsibility(责任心)被认为是父母必须在孩子身上开发的三种基本特性，领导的桂冠总落在这种人头上。他们努力照习惯去理解和容忍，他们屡次在挫折面前另辟蹊径，他们勇敢面对自己行动产生的后果。

食物是童年所有的梦想

别人的人生从一天开始，我的人生是从一顿开始。从那一顿之后，我就梦想能自己完整地吃掉一只烤鸭。

文 / 和菜头

关于童年的事情，99%的内容都和食物有关。和所有的食物相比，烤鸭意味着甜蜜美满的人生，圆融无碍的境界，以及完美的理想彼岸。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发了狂一样梦想着一个人吃掉一整只烤鸭。

我生于1975年，改革前3年。在我的记忆深处，30年来一直有一枚鸭子在闪闪发光。每次当我试图在记忆深处找寻一点庄严的、厚重的、深刻的事物，可以用梦想或者理想这种字眼装点的往事，那只烤鸭就从不知哪个角落里钻将出来，熟练地躺在一个白色的瓷盘里。躺好以后，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又抬起头用扁嘴拖过一碟葱白和一碟面酱来，这才安然睡下。多少次我看见自己站在了绝岭之上，高擎红旗，正准备高呼口号。但是还不待我开始张嘴挥旗，一盘鸭子就会从半空里砸将下来，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我只能缩在盘子的一角，小心翼翼地举起拳头，捏着嗓子喊一声：理想万岁！准确地说，我似乎是在喊：理想万岁？

这只鸭子几乎成为了我永恒的梦魇。它慢慢吞噬我的每一个脑细胞，入侵每一晚的梦境。但我的童年记忆里绝对不止是鸭子，而且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鸭子只是在金字塔的顶端而已。关于童年的事情，99%的内容都和食物有关。它的底层是一系列不需要金钱就能得到的食物，包括桑葚、野草莓、邻居家自留地里的胡萝卜以及向日葵。在我小学三年级之前，就已经如同神农

一般遍尝各种野生植物，把食谱一直延伸到昆虫界。其上是要花费一分钱到5分钱不等的食物，从小豆冰棍到爆米花，不一而足。它们构成记忆中甜美而易逝的部分，就像是雪糕。在这个食物链条的顶端，放着一只金光闪闪的烤鸭。

我对于一年才能随父亲回家探亲一次毫无怨言，我对全家四口全挤在一张床上并无异议，我甚至可以接受老师和家长的轮流体罚，但是我接受不了一只烤鸭要四个人分着吃这一残酷的事实。当我在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烤鸭的时候还没有上小学，世界上怎么会有烤鸭这种玄秘的事物存在？这种事物又怎么能和他人分享？

当它被切开时散发出神异的香味，如同莲华绽放，佛陀正坐在莲蕊正中，世界在无边平和中显示出深邃的奥秘，这种奥秘来自烤鸭的腹腔，那里吸收了火焰的奥秘，以及一只鸭子所有在河边和丽日下的感受。撕咬它，牙齿慢慢切开酥脆的鸭皮，进入滑腻丰富的油脂，终于触到富于弹性的鸭肉，并且因为这种微弱阻力而有了瞬间的暂停。就在这一瞬间，鸭皮鸭油和鸭肉形成的三重芳香被完整释放出来，加上一点葱白的尾调，我看见水光接天，一片泽国正在走进金黄的暮色。伴随着吞咽的动作，内息从身体最深处被唤醒，沿着中脉上升，一直直冲顶门放射而出。整个世界都被白色的寂静之光所笼罩，消失了所有对立和矛盾、烦恼和痛苦、饥饿和疼痛，只有软绵绵的幸福留存，无一不适。

别人的人生从一天开始，我的人生是从一顿



“教授治校”在南京大学并不是一句空话。陈朗说，学校尊重教学规律本身，按照以教授和学生为核心的思路来办学，换句话说，就是很“宠着”老师和学生。



和菜头，毕业于南京大学气象学专业，微博名人，知名网络写手。



开始。从那一顿之后，我就梦想能自己完整地吃掉一只烤鸭。包括左腿和右腿，完整的脖子和每一块软骨。不用分心凝视别人的筷子，不用忍痛和任何一块鸭子告别，觉得自己幸福的大饼正一点点变成残月。在讲述那个脖子上套着饼却被饿死的懒汉的故事时，给我最深触动的是：一个人居然可以拥有那么大的一张饼！可以想见，童稚的我把这个故事理解成为一个关于食物的故事，并且相信问题的关键出在没有配咸菜。“其实，没有咸菜也可以对付。”我无限惋惜地那么想着。

我在大学二年级拿到第一笔勤工俭学的工资时，第一个从心头升起的恶念不是去买香烟，或者是去卡拉OK，而是冲出去买了一整只烤鸭。带着炉火温度的烤鸭，热气腾腾的烤鸭，配上足够面酱和大葱的烤鸭。梦想达成时会产生强烈的颤抖和眩晕，巨大的罪恶感会折磨你的灵魂和胃壁。没有家人共享的时刻意味着足够的孤独，足够的孤独说明你已经长大成人配得上这只美好的烤鸭。我们很相衬，哪怕隔着两层塑料袋。我不知道在环保的今天人们如何去实现类似的梦想，在布袋里装一只斩好了的鸭子？

从达成梦想到放弃梦想只用了15分钟，没有想到世界上竟然有那么油腻和塞牙的东西。它们在我面前堆积如山，梦想中的强烈幸福感并没有如约降临，拥堵在心头不去的感觉是恶心。我的鸭子冷了，硬了，凝固了。那是在1995年的南京，冬天，珠江路上刚开了一家肯德基。在一个有肯德基和20元包场火锅的时代里，一个人吃掉一整只鸭子不单显得很怪异，更像是一种低智商犯罪。我只能安慰自己说，那不是我梦想中的那只鸭子。它依然在梦想的彼岸，在垂柳下悠闲地散步，距离炽热的火炉还有相当距离。

2008年夏天的时候，我在北京大董烤鸭再吃了一次鸭子。那里没有预约，需要排队等候一个小时以上，各国使节带着虔敬的眼神趴在窗前看大师傅翻烤鸭子。菜单上有中英日三种语言，而且每道菜还需要配上一句宋词。鸭子是被盛在一盘水墨山水画里送上来的，鸭皮酥脆清香，鸭肉入口即化。如果梦想中有过一只鸭子，那么大董的鸭子可能是最接近它的了。如果鸭子也有自己的八宝山，那么大董的包房里就是它们哀荣备至的追悼会。一切堪称完美无缺，连灯光都是那么的荡漾。

我突然发现，无论如何我都吃不下一整只鸭子，我的食欲连同我的梦想都已经消失不见。那一晚，我梦见盘子里的鸭子振翅而去，身后带着桑葚、野草莓、胡萝卜、向日葵、小豆冰棍和爆米花。它们飞过麦当劳汉堡的云团，穿过哈根达斯的风暴，越过X-Box和iPod的电离层，从此消失不见。（家庭学堂）

链接

很小的时候，我就习惯了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而且觉得山林就是我的家。能一个人在山里转一天，累了就采集一堆松针铺床，睡上一会儿。一身泥汗地回到家，被我父亲提着耳朵拉到对面基地饲养场，脱光了用冲猪圈的水龙头一气猛冲，然后就神清气爽地回家吃晚饭。后来看《西游记》，我老觉得孙悟空就是我，而且还不如我呢。

一个人闷在家里的时候，我逐渐发现读书是件很有乐子的事。在读幼儿园的时候，最先翻完了一本《365夜》，找我父亲换书。父亲不相信，说你字都没认全呢，怎么可能看得完？我说我可以根据前后文猜啊！他找了几段叫我念，我还都能结结巴巴念完。父亲大乐，从此每周带我去服务社的书店买新书。那地方距离我们的宿舍有3公里，每次去之前都要问我：要书还是要冰棍？我总是选择要书。一个小孩子，在大日头下来回走5公里，但是为了书坚决不要冰棍，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事。他不知道我的算计，冰棍吃完了就完了，最多咂咂棍子的滋味，但是书可以随时再翻出来看啊！

——选自和菜头《回忆我的童年》

我是世界“首富”的穷儿子

巴菲特却不时提醒儿子：“要学会用自己挣的钱，去做更大的梦。”

文 / 阿伦

他的父亲——奥伦·巴菲特，全球最著名股票投资商、2008年超越比尔·盖茨的新世界首富、众多名流富豪挤破脑袋花近百万与其共进午餐的“股神”。作为全球最引人注目的“富二代”之一，奥伦·巴菲特将怎样去续写“股神”父亲的天资和荣光？

“股神”爸爸只是个普通小老头

彼得的童年时光，是在美国中西部小镇奥马哈度过的。父亲在他两岁时，花3万美金，买下了一栋建于20世纪初没有围墙的老房子。

那时，父亲奥伦·巴菲特一点名气都没有，家庭条件和其他普通美国家庭没什么不同。“很小我就知道钱要靠自己挣。父亲跟我和哥哥姐姐说：‘我的钱都是干活挣来的，所以不会白白给你们。’”为了挣点零用钱，彼得总是抢着干活：扫地、擦窗户、给花草施肥浇水。

那时候，彼得家中的后门全天敞开着，邻居可以随时进出。因为，热情好客又喜欢当“知心大姐”的母亲朋友遍布整个小镇，女人们有什么生活和感情上的郁闷，都喜欢来找她倾诉。

在外人眼中，奥伦·巴菲特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股神，但在彼得和他的哥哥、姐姐眼中，他就是一个日渐苍老的普通老头。至今，巴菲特还和妻子住在他50多年前花3万美金买来的那栋老房子里。

彼得曾经问妈妈：“为什么一夜之间，我

们家就变得有钱了？”因为他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父亲，他走在路上，有人对他指指点点。彼得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啊。电视机、冰箱和沙发用了多年，跟普通人家的一样。父亲依然穿得破破旧旧，而母亲还是那么热情开朗。美国媒体和商界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巴菲特只会赚钱，不会花钱，更不会做父亲。

钱只会让纯洁的父子关系变得复杂

“当我问他为什么别的小孩不用干活就有钱，他总是说，因为你的父亲是奥伦·巴菲特。”但是，当彼得17岁时，父亲在投资方面的才能和他的财富，开始被美国人津津乐道。这一年，彼得经由《华盛顿邮报》发行人的一封推荐信，进入了斯坦福大学学习。

他跟父亲说，如果自己不是巴菲特的儿子，那么就不会遭受别人的质疑了。父亲说：“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来证明你当之无愧呢？再说，你不是一直想要挣更多的钱吗？读这所大学的商科是最好的起步。”于是，彼得开始埋头努力学习，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将20门基础课全部修完。但是彼得却一点都不高兴，他跟父亲说：“如果我辍学，您是否会觉得脸上无光？”巴菲特笑着答：“你的姐姐和哥哥，不也是这样吗？人们顶多说你步了苏茜和豪依的后尘。”

父亲还跟他说：“我知道你一直想做自己的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父亲那么做，只不过是想去经历和懂得生活，父亲的爱不是金钱而是信任。



阿伦，系《东方青年》杂志编辑。



事情，比如做音乐家。而我曾经那么希望你能做一个投资家。我仍然记得你7岁那年，坐在钢琴前，把一首欢快无比的《洋基队歌》弹成了哀乐。”父亲接着说，能把欢快的音乐弹成哀乐，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弹奏者心情糟糕，二是他具备非凡的音乐天分。

中途退学的彼得准备投身于音乐创作。但是，他身无分文。不用问，父亲不会再给他一分生活费。“这是因为我已经19岁了，而且父亲本来就是各个吝啬鬼。”彼得笑着说。祖父曾经给了他9万美元，但却被父亲拿去变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他跟儿子说：“再过10年，这些钱至少能变成900万美元，30年之后，也许就是5000万。”彼得却很快就卖了股票，拿着这笔钱搬到旧金山，租了一套小房子，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然后，他在报纸上刊登分类广告，为人们提供录音服务，每小时35美元。断断续续地有顾客来，一个星期录几个小时，赚一两百美元勉强度日。

巴菲特却不时提醒儿子：“要学会用自己挣的钱，去做更大的梦。”

终于等来了机会，某天彼得正在擦洗那部破败不堪的车时，邻居把他介绍给了自己做动画制作的女婿，为一个新成立的有线电视频道做10秒钟的插播广告，报酬1000美元。这让彼得兴奋不已。很快，那个电视频道因此大火，这就是著名的MTV音乐频道。

从那以后，彼得可以靠作曲为生。“扩大音乐工作室规模、租房子、结婚，购置参加活动的西装。这些都是我自己挣的钱。”彼得得意洋洋地跟父亲炫耀时，巴菲特也不说话，而

是微笑着点头。

父亲的爱，不是金钱而是信任

父亲拒绝借钱给自己，彼得还是沮丧了好一阵。他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富豪，为何却不肯借给自己儿子一个子儿？彼得一气之下贷款买了套大房子，每个月负担几万美金的贷款。几年之后，他不堪贷款的压力，又将大房子卖掉换了套小公寓。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父亲那么做，只不过是让他自己去经历和懂得生活，父亲的爱不是金钱而是信任。

彼得一度想把音乐舞蹈剧《魂》做成巡回演出，但需要很大一笔钱，父亲跟他说：“你先去筹到90%的钱，剩下的10%，我借给你。”于是，彼得去找很多机构和人，他们无一例外地问：“你没有钱吗？没有的话，跟你爸要不就得了？”彼得不得不厚着脸皮跟人说：“其实，奥伦·巴菲特除了做慈善事业很大方外，从不轻易给人一美分。”原来，靠巴菲特的姓氏是借不来钱的。谁会相信身价几百亿的富豪之子，竟然会开口跟人借几十万美元？

靠着四处筹措的钱和父亲借给他的那10%，由彼得策划、编写、制作的音乐舞蹈剧《魂》终于在华盛顿国家广场进行了盛大演出。母亲、哥哥和姐姐去看了舞蹈剧，但是父亲没有去。“他没有接到我的邀请。我为什么要让他去破坏气氛抢了我的风头呢？”彼得大笑着说。

然后，他出了数张专辑，凭借讲述印第安原住民的剧集《500部落》获得美国电视节最高荣誉“艾美奖”。然后又凭借为好莱坞电影《与狼共舞》的配乐，夺得奥斯卡奖。他靠自己的努力，为妻子和女儿在密歇根湖买了别墅，也终于有了专业级别的音乐工作室。彼得也让所有人心悦诚服地对他做出这样的称赞：“我很惊讶你竟然没有子承父业，但我更惊讶的是，你居然成了音乐界的‘奥伦·巴菲特’。”

2006年，全世界见证了奥伦·巴菲特的一大善举，他宣布把大部分财产，高达370亿美元的钱捐给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彼得说：“父亲尽管积聚了那么多财富，但那些钱他最终都要用于慈善。对他来说，越来越多的金钱，只是对他投资天分的一种肯定。而我的音乐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就是对我音乐才能的肯定。”

现在，彼得和父亲每年最多能见四五次面。平时，他们会互相打电话，告诉彼此前些天他们在干嘛，遇见了什么有趣的人和事。（《东方青年》）

菜虫虫不想 7 岁

时间在菜虫虫的童蒙时代，就是一个封闭的围合，夜与昼在这个封闭里面周而复始。在菜虫虫真正懂得时间是什么之前，时间就尚未展开它的一维向前的性质。

文 / 蔡朝阳

除夕守岁，菜虫虫熬到零点。时钟敲响的那一刻，我跟他说：过了现在，你就7岁啦。菜虫虫坐在垃圾桶上，手里捏着几张纸牌，斩钉截铁地反对：我不想7岁，我还是6岁。我大奇，便劝说道，7岁好啊，你就长大了，是个小伙子了。菜虫虫继续反对：我不要长大，我要做小孩子。

我不由哑然失笑。这个除夕的晚上，菜虫虫第一次在醒着的状态下迎接新年。然而他很困惑：为什么过了今晚，他就得7岁，而之前他就是6岁？菜虫虫或许认为，只要他坚持，他就可以不是7岁。我想起了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里面的奥斯卡不想长大，就真的没有长大，直到后来，他决定长大了，才真正长大。《铁皮鼓》是一个非凡的隐喻，因为人的成长确实跟自身的认知有关，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当然，菜虫虫不想7岁的主因是最近处于逆反期，凡爸爸妈妈说的，一概反对。我知道这是他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尽管这段时间的相处令爸妈挠头，我仍乐于见到他的人格独立。

还有一些现实原因，可能更重要。我们一直在跟菜虫虫说，7岁，就变成大孩子了，就可以去上小学，就要一个人睡一个房间，自己把整碗饭都吃掉，自己洗脸刷牙，自己穿衣服洗澡。看来，菜虫虫感到压力山大。于是，他想，只要决

定仍停留在6岁，就可以摆脱以上全部的压力。

其实，时间在菜虫虫的童蒙时代，就是一个封闭的围合，夜与昼在这个封闭里面周而复始。在菜虫虫真正懂得时间是什么之前，时间就尚未展开它的一维向前的性质。所以菜虫虫只要自己坚持，就仍将6岁。

为什么要听话

菜虫虫深为明白“话语即力量”的哲理。5岁，进商场时，菜虫指着自动门，说：芝麻芝麻开门吧，自动门果然开了。这扇门，是在菜虫虫话语的指令之下才打开的。菜虫虫去冰激凌店，指着DQ的巧克力蛋筒，说，我要吃这个。果然，他吃到了。圣诞节前，菜虫虫又说，我想要一个植物大战僵尸的绒毛玩具做圣诞节礼物。12月25日一早，菜虫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破天荒的没有懒床，果然，他在圣诞树下发现了一个豌豆射手和一个读报僵尸。所以在除夕的夜晚，他只要说“我还6岁”，7岁就不会到来。

当然，几天以后，菜虫虫承认了7岁的现实。因为，6岁的时候上床睡觉，讲完故事之后，爸爸妈妈允许他还可以玩6分钟才熄灯。7岁了，这段玩耍的时间就可以延长到7分钟。这可太棒了，菜虫虫很得意，至少7比6要多。“那么，”菜虫虫说，“将来我20岁了，就可以在熄灯前再玩20分钟了。”



就像《小王子》里说的，你以为谈论股票、投资、生意、领带以及一场棒球赛就很了不起吗。在孩童的世界里，一只要去 B612 星球的小羊有没有戴口罩，比你们以上全部事情加起来还有重要很多呢。



蔡朝阳，任职于浙江省绍兴稽山中学，人称“麻辣语文老师”，与郭初阳、吕栋合称“浙江三教师”。



菜虫虫深知话语的力量，因而他最讨厌“小孩子要听话”这样的说教。一般我们出门，事先都会跟菜虫虫说好，目的地是哪里，要做些什么，买什么不买什么。只要说好，菜虫虫就很配合，他还算一个懂得契约关系的小孩，也知道说话算数。但有时候也有突发情况，或者新的变化，这个变化若是菜虫虫不喜欢，他就不干。我这样劝菜虫虫：小孩子要乖，要听大人的话。菜虫马上反驳：大人要听小孩子的话。

开始我想，这无非是逆反心理而已，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回事。因为话语即力量，菜虫虫深知此中奥妙，那么大人的话语有支配的能量，小孩子的话语何尝没有支配的能量呢？是以菜虫虫反感“小孩子要听大人的话”这一说教。要知道，在菜虫虫6年的生命中，他多数欲求的满足，都是通过言语发出指令而得以实现。这个抉择的时刻，菜虫虫不屈不挠，宁可大哭一场也要捍卫自己的话语权。他带着哭腔说，爸爸，大人要听小孩子的话，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直到我妥协，跟他说，菜虫虫啊，有时候爸爸妈妈听你的话，有时候你听爸爸妈妈的话，要看谁更有道理，好不好。这样，菜虫对言论自由的捍卫才告一段落。

这个问题令人挠头。凭什么，小孩子就要听大人的话，为什么不是大人听小孩子的话呢？尤其是，父母不能以粗暴的强制力驯服他，可成年人生活经验比你丰富之类的道理，你又如何跟小朋友解释？至于成年人急于要办的事情，我倒觉得还真没什么重要的，就像《小王子》里说的，你以为谈论股票、投资、生意、领带以及一场棒球赛就很不了不起吗。在孩童的世界里，一只要去B612星球的小羊有没有戴口罩，比你们以上全部事情加起来还有重要很多呢。

时间与生命的始终

菜虫虫不想7岁，但他最后终于承认7岁了。因为他发现，实际上7岁跟6岁没有什么区别。自己吃饭已经好久了，穿脱衣服也一直在学习之中，冰激凌跟巧克力仍受到限制。比较有挑战的是，最近妈妈竟然叫菜虫虫学习系鞋带，还好菜虫虫选择了坚决不学。

究竟几岁暂且不管，菜虫虫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人的年龄，该什么时候开始算，而这个“开始”之前，“我”又在哪儿？这是菜虫虫对生命起源的第一次质疑。那大概在2010年10月，有一天，睡觉前，他趴在妈妈肚子上玩，突然就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幸好我看过黄晓星的一本书，里面有一个对生命起源的美好故事，就拿来念给菜虫听。之后，菜虫就知道了，在来到这个家之前，他住在星星上。

接下去的故事，发生在6岁时。2011年上半年，有一天，在外婆家吃完晚饭，我们回家，菜虫虫突然问：爸爸，为什么外婆家没有外公？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现在，菜虫虫出其不意地提出来了。

我担心的直接原因，自然是外祖父的壮年早逝。这是妈妈、舅舅及外婆一家深深的痛楚，我们平时几乎不提。担心的第二点，便是，我不确定，究竟菜虫虫在什么年龄段，怎样的认知水平时，我才可以跟他谈论死亡这件事。我买过一本《跟我的孩子谈死亡》，一个法国教授写的，问题是这个法国孩子，已经10多岁了。而菜虫虫提到这个问题时，才6岁。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时间，什么叫长大，什么叫人生。

幸好，有“星星上的居民”这个美好的故事。我终于可以跟菜虫虫说，外公是回到星星上去了。因为我们以前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住在星星上，来到世间后，外公想念那颗星星，就先回去了。菜虫虫接着问，那么，外公是怎么上去的呢？菜虫虫这么问也有依据的，星星那么远，那么高，够不着呀。并且，在生命起源的那个故事里，菜虫虫是跟彩虹、雨点一起来到世间的，那一刻，大家都开心的拥抱亲吻。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回去呢？飞回去。我说。我也有依据。因为菜虫虫看过绘本《云朵面包》，吃了云朵面包，就变得很轻，就可以飞上去了，像白云一样在天空飞。

哦。菜虫虫明白了。翻了个身，不久，就安然入梦。（蔡朝阳新浪博客）

对付熊孩子的招数不只是逃避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身边没有成人在，儿子给欺凌了，没人可以帮他，最容易的解决方法是逃避。但逃避不是办法。

文 / 查可欣

儿子毛毛头第一次被欺凌发生在念小学一年级时，有个高年班的男生，多次趁着放学、所有学生齐集操场、老师忙于安排同学上校车时，跑去推撞儿子，有几次儿子给他推跌地上，幸而没受伤。

此事让我想起念小学时，也曾遭高年班的女生欺凌，母亲怎样保护我，我决定抄袭母亲的方法来保护她的外孙。

翌日，我特意提早到学校去接放学，但不现身，躲在一角，看到毛毛头从楼上的教室走到操场，离他不远处，有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男生不怀好意地从儿子后边跑过去，我跟在这男生后面，当他预备出手推毛毛头时，我搭着他的膊头，他伸出去的手仍悬在半空，男生回头望向我，我叫毛毛头认人，是不是这男生推撞他，毛毛头认出是他。

“你叫什么名字？”男生紧闭着嘴。“你不说没关系，我带你去见校长，他应该知道你的名字和念哪一班。”男生不再争持，将他的名字和班级告诉我，是个三年级的学生，我将他的名字和班别重复一次，跟他说：“你不要再欺负任何人，我每天都会来躲在不同的角落看着你，如果你再欺负他或其他人，我会带你去见校长。”

在毛毛头升小二的暑假，我安排他参加一个本地夏令营，夏令营为期两个星期，第一天回来，他兴高采烈地讲述午膳膳食怎样、玩了什么

游戏。但第三天回来，他第一时间要求：我不要去夏令营了。我直觉知道有事发生，用闲谈方法旁敲侧击，知道真相了。

原来夏令营有个小胖子，趁导师更衣未到泳池前，从后用力将毛毛头的头按入水中几秒才放手，导师来了，小胖便若无其事走开。连续两天毛毛头都遭受小胖子同样的欺凌，令他愤怒和害怕会被伤害，无助之下唯有拒绝再去，避开小胖子。

很体谅小儿子的反应，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身边没有成人在，给欺凌了，没人可以帮他，最容易的解决方法是逃避。

没想到，第二天儿子从夏令营回来，愉快地回答：“我跟他做了朋友。”方法很简单：“我走过去跟他聊天，讲大家喜欢的玩具，讲自己学校的事，就这样做了朋友。”没想到毛毛头想出了第六个方法。

翌晨，送他去夏令营集合地点，小胖子已到了，早已坐上车一个窗旁的位子，见到毛毛头到来，大力挥手招呼，示意毛毛头坐他身旁。目送儿子上车，小胖子欣喜地站起来迎接，两人似有说不完的话题。每天从夏令营回来，毛毛头都欢天喜地，到了最后一天他显得不舍。

此事，毛毛头反过来提醒我，沟通可化干戈为玉帛。这份礼物是他送给我的。（南都周刊）



毛毛头反过来提醒我，沟通可化干戈为玉帛。这份礼物是他送给我的。



查可欣，香港著名传媒人，主持人，专栏作家。

《教育》杂志

中国教育杂志的视野之窗

www.1000thinktank.com/jyzz

《教育》杂志是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周怀北博士组织筹办、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担任主编的月刊。

该杂志旨在关注国内教育界情况的同时，展示海外教育风貌，分享成功的教育理念，批判典型的反面案例。希望《教育》杂志能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思路。



订阅小站



亲爱的读者朋友，
如果您想订阅《教育》杂志，
请扫一扫《教育》杂志订阅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即可；
也可拨打027-86758873-8124，与我们联系，
感谢对《教育》杂志的关注和支持！



千人智库

205 关注 | 11552 粉丝 | 488 微博

+关注

私信



V 微博认证

Lv.8

北京千人智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类别 商务服务-咨询顾问

更多 >

吕世浩：这不是历史：国立台湾大学的吕世浩老师认为，现代的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目的是培养工匠，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历史没有用；相比之下，传统贵族教育非常重视历史，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领袖，在中西方都是如此。

李开复：【家庭教育：我的五个“规矩”定律】1) 定好规矩，但是首先把规矩的道理讲清楚，不是盲目地服从；2) 在规矩内孩子有完全的自由；3) 违背了规矩孩子将受到事先讲好的惩罚；4) 规矩越少越好，才能做到启发的作用。5) 孩子越大，规矩越少，放权越多。

王人平：时间管理的七种小方法：1、小任务立即处理。对于任何一件事，完成它如果小于2分钟，就立即执行，别“等会儿再做”；2、击退干扰，过滤不重要的事情；3、区别优先级，找出重中之重；4、设置切实可行的截止时间；5、一段时间专注于一件事；6、别贪心，敢于交出工作；7、把计划写下来，不要放脑中。

思想聚焦：性情的修养，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增强生活能力。修养的基础是内心对话，人在这种对话中既是自己的原告，又是自己的辩护士和法官。修养之于心地，其重要犹如食物之于身体。以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

宋佳：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一场修行，是孩子的纯真、无私、灵动洗濯了成人的浮躁、功利、自大的心理历程。好的教育，应该是通过孩子这面镜子，不断发现自我、修正自我、挖掘自我，并用新我来为孩子做示范和表率。我们是在教育的过程中，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中国教育研究：【家长的五个层次】第一层次：舍得给孩子花钱。第二层次：舍得为孩子花时间。第三层次：家长开始思考教育的目标问题。第四层次：家长为了教育孩子而提升和完善自己。第五层次：父母尽己所能支持鼓励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也以身作则。

姜岚昕：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唤醒，是种教育手段。父母和教师不要总是叮咛、检查、监督、审查他们。孩子们一旦得到更多的信任和期待，内在动力就会被激发，会更聪明、能干、有悟性。

宁波教育：【我们迷茫的3大原因】①读书少，书是通往智慧的直线，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②交往少，越停留在自己的小圈里，就越孤陋寡闻，久而久之，就没有自信和优秀的人交往；③不去看外面的世界，走出去才知道什么伟大和渺小。所以，趁年轻，多读书，多交往，多旅行。



赵忠心家庭教育：教育者先受教育这是规律。家长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家长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自己做人不成，想把孩子培养成为品德高尚的人，犹如缘木求鱼。自己很幼稚，要把孩子培养成为成熟的人，犹如升山采珠。中国家庭教育成功的典范窦燕山培养“五子登科”的经验就是先提高自己的人品修养和人格。

朱永新：叶圣陶教育箴言 # 尝谓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谓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

传媒老王：“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梭罗的方式是，到瓦尔登湖边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你当然不必像他。----《瓦尔登湖》梭罗著。

事实聚焦：中国的英语教育相当失败，一个学生不管英语成绩多好，毕业之后两年，基本全部忘记，既浪费教育资源，也浪费学生的青春。症结在于：学外语，应该以口语课为主，不应以语法课为主。逻辑很简单：会说了，自然会写；会写，却不一定说。中国主管英语教育的人，应该深刻反省。

周国平：教育是精神属性的生长，人性意义上优秀的人的形成，实现的是人的目的价值；培训是以职业为目标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实现的是人的工具价值。杨东平更尖锐地指出：应试教育下，教育变成教学，教学变成培训，培训变成监狱。

乾登：大学，不是为了教你如何能找到你的第一份工作；大学，是为了教你如何正确地去思考、推断和质疑。——哈佛大学校长 Drew Gilpin Faust

李文的智牒：胡适：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做父亲的，断不能不出外干事，断不能常住在家中，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

克里斯托夫-金：资中筠：“古往今来，腐败一直存在。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我们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过去国民党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没有腐败，现在是全社会各界腐败，最可怕的是小学生接受腐败教育。”——微评：没有腐败机会的人，在腐败肥沃的土壤里，也会滋生腐败的欲望。



- [○ 首页 ...](#)
- [○ 消息 ...](#)
- [○ 收藏 ...](#)

展开

○ 热门话题

- #985、211高校存废之争#
- #高校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
- #2015年考研#
- #小学生校车运行安全#
- #“掐尖大战”移至高考后#

查看更多 >>



扫一扫，更多惊喜。

美国为什么没有 985 或 211 大学？

治本，才是关键。中国的高校需要的是生存竞争。

文 / 王青

网上逐渐传出新闻，国家已低调废除985和211高校，新一轮的拨款目前都没有下发。从各方的反应来看，虽然这个传闻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是肯定的。而且就算是985和211工程继续执行，有关方面对于高校改革的反思显然已经在进行了。

借助他山之石的视角，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有必要废除985和211工程，或是说，高校改革应该向哪个方向走。把目光转向我熟悉的美国，在大家反复谈论美国的教育如何如何之际，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美国的“重点大学”，美国所有的只是私立大学和公立/州立大学的分别而已。因为公立大学依靠政府拨款，在经费划拨和监管方面跟中国的大学才具有可对比性。不过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对比公立大学的时候，还是要时时把美国的私立大学扯进来，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才能够看得清楚。

美国的传统是私立大学，由个人或团体出资兴办，运行基本依赖于收来的学费。州立大学是后来兴起的，比如我的母校UCLA(洛杉矶加州大学)是在1919年成立的，那才不过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的时代，跟哈佛(创办于1636年)近4百年的历史根本没法比。现在，美国的每一个州，至少有一套州立大学系统，而加州不但有举世闻名的加州大学系统(10所UC)，还另外有一套加州州立大学系统(23所CSU)，以及全美国在效仿的社区大学系统。美国的联邦政府也有若干大学，主要是军事学院，向为国效力的军人、退伍军人、打算参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服务的。

政府出钱办大学，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国人习

惯了大中小学都是政府在办，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答案竟然简单得出奇，就是要让符合大学入学条件、而又付不起学费的孩子有一个上大学的机会！加州大学系统(UC)，就有7万5千名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这个数字是美国最高的，而且全部加大有一半的学生完全不付学费。就学术要求而言，UC的入学要求，是加州高中生最优秀的前八分之一，加州州立则是第二个八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没有入学门坎、学费比加大还要低很多的社区大学，有一个问题应该不需要多说了，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美国孩子因为贫困而不能上大学的。其实，帮助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或是需要帮助的群体，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既然开门办学，就希望把学校办好，这样才能吸引优秀学生、学校的声誉和水平才能上去。加州大学在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是集中资金火力的策略。比财力，私立学校怎么都比不过政府的。于是加大把钱投在最昂贵的方面，就是科研。所以凭着加大这短短的历史，已经先后有50多名诺贝尔获奖者了。这样的实力，谁也不会小看。所以这些关键的UC，现在排名都很靠前。

反观中国大学的资金投入，国家是有一个美好愿望，就是希望重点投入，让985和211这样的学校能够脱颖而出。可是，这里缺乏了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大学系统本身是没有竞争的，不存在生存危机。985和211跟过去的委属、部属重点大学的性质一样，就是大锅饭体制的产物，反正是国家单位，等着拨款就好了。就生源而言，反正是基于高考分数去“切”学生，越是重点、越得到投资，就越能吸引考生。这样没有竞争和生存意识的状态，

自然会制约学校的发展。国家在反思这个情况，在考虑资金的重新安排，但是却没有想到任何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不会有有多大起色的。

美国的州立大学面临竞争，所以就有2个部门是中国的大学完全没有的：商业运行和市场推广。为什么要有商业运行部门(business department)呢，就是要决定怎么花钱，要报预算，要根据经费数额决定做哪些事情、不做哪些。比如，州立大学也收一些学费，而这些学费主要的用途是给贫困学生发资助了，在过去几年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商业运行部门就会特别对学校提出，要多招全额付学费的学生。道理很简单，如果招来的学生需要资助，学校“净”收入就减少了。商业部门就是看钱，其他的决定权才在行政。而在中国，商业运行这一块总是和行政搅在一起的，钱的事情自然就被权力制约了，所以钱花不出效率来。

至于市场推广就更重要了，这就是生存和竞争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政府又是在用经费的宏观杠杆在管理学校。美国最初是学生只要出很少的学费就可以上州立，市场部就是要去和那些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竞争。那时，政府的拨款是按人头给的，招来的学生越多，学校获得的拨款就越多。慢慢地美国开始推一个平权法案，就是学校的人种比例一个和当地人口比例一致，否则一些专门的经费就不能得到。这样，就会出现学校拼命去抢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好学生，因为他们够条件的不多。而亚裔呢，现在加大的亚裔在往40%走，而人口中的亚裔比例才10%左右，这样美国被迫放弃了大学入学的平权法案，而很多不明情况亚裔，还在喊受歧视了呢。至于到了最近，美国财政吃紧，对大学的拨款要和学生表现联系起来，毕业率、按时毕业率、受处分的比例等都换算成拨款系数，这样做市场推广和招生的部门就更辛苦了，还必须得招“好学生”才能确保学校的经费到位。

就在写这一篇文章的今天，加州州立的北岭校园爆发了抗议，抗议最近提出的加大和加州州立学费上涨的一个提案。州立大学经费不够了，唯一能打的主意就是学费了。反正有私立大学在做对比，目前像伯克利和UCLA这样一流的加大，本州居民一年的学费才1万3左右，对照同在加州的南加大USC(一年4万7)和斯坦福(一年4万4)，加大还是有很大的“涨价”空间的。其实，中国的大学在经

费改革方面，多收一些学费也是有益的。不要急着骂人，任何人或家庭交学费只是短暂的几年，而纳税却是一辈子的事情。打破大锅饭，不但学生更珍惜上学的机会，广大纳税人实际上还省了钱了。

所以，不论985和211是否延续，也不论有关教育不平等的批评怎么说，政府对于高校的经费管理，更应该是杠杆式的，也更应该去照顾经济上需要援助的贫困学生。大学要有自主权，更应该有生存危机，要打破就是上面拨款、下面学生拼考试分数的不上进现状。而中国教育的改革，最大的症结还就是在高考。高考这个“八股”式的人才遴选制度，是高校吃大锅饭的基础。这个万恶的制度不从根本改变，经费怎么划拨，都是换汤不换药，反正各个学校都不会有生存危机，就是等着上面拨款好了。拨得不够，还可以去闹、去叫，有时候地方政府还会出来补贴。

治本，才是关键。中国的高校需要的是生存竞争。
(教育专栏)

链接

985、211 的前世今生

“985工程”介绍：1998年5月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因此，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全国共有39所高校。

“211工程”简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这是我国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而实施的一项跨世纪的战略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项目。“211工程”自“九五”期间立项建设，中央和地方共投入资金180亿元。全国共有112所高校。

王青，美国 TOP SPEED(腾速) 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

我的心一点也不老

即使到了人生的黄昏里，也在享受尘世生活里的苦乐酸甜，也给迷茫肆长的年轻人真谛的传扬——我只是年龄在变大，但是心却一点也不老。

文 / 肖娟 李辉 章小东 王文

谁说老了就一定是老态龙钟？这些世纪老人，用生命走出了一条隽永而智慧的路。他们可敬、可爱、可亲，即使到了人生的黄昏里，也在享受尘世生活里的苦乐酸甜，也给迷茫肆长的年轻人真谛的传扬——我只是年龄在变大，但是心却一点也不老。

叶曼：生命是一座玫瑰园或是尘世地狱，全在自己

叶曼这个名字于我最早是在三毛《送你一匹马》中见到，三毛简短提到她和叶曼老师的三次谈话。只言片语但谈吐优雅，睿智。叶曼说一个人，尤其是女人拥有了智慧才能更好驾驭自己的命运与人生。

叶曼老师从小出生书香门第，国学底子深厚，长大后足迹遍及海内外，学贯中西，精通儒释道三学。她讲课声音悦耳，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口吐莲花，一堂课下来，让你受益终身。

2007年夏天，叶曼老师应邀在北京佛教居士林维摩讲堂讲授《道德经》与《维摩诘经》。能容纳300多人的维摩讲堂座无虚席，甚至讲堂外的走廊、院子里都挤满人。课余，常有人会问，老师97岁的高龄，可从她那优雅的举止、清新的书卷气看上去也就60多岁，而且皮肤白皙、干净，精致的脸上连皱纹都很少见到，是否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老师笑着回答，如果真有灵丹，秦始皇也许不会花那么大的代价建造举世闻名的兵马俑。

老师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她常说，三日不读书，面目亦可憎。她还经常说一本好书包含了作者一辈子的经验

及智慧，而我们只需要数小时就能吸收，花几十元就能换来，天底下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

除了读书、讲课、静坐之外，老师还要不时会见慕名而来的客人。对上门来的客人，无论男女老少、来自哪里、做什么工作，老师无一例外地要和颜悦色问他们有什么问题要交流。有人常暗示自己的命运不济或时运太差，请教老师如何改变命运？老师是这样回答的：命是我们的本命，运是时运。

《了凡四训》里的丁老爷，努力积善行德，三年之中，与夫人一起做了一万件善事，后来不也改变了自己的时运吗？所以“命自我立”！我们完全依靠自己可以转变。生命是一座玫瑰花园抑或是尘世的地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心灵。

黄永玉：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黄永玉先生每天的安排都很忙碌：上午，在书桌上摊开印有“黄永玉用”的稿纸，竖排，每页五百字，动笔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小说在《收获》杂志连载两年多，几近五十万字，内容才写到10岁。下午，走进画室挥毫创作，兴致来了，时常连续站几个小时，不喝水，不吃饭，不上厕所。晚上的时间，属于朋友，属于音乐与电视。讲不完的笑话，喟叹不已的故事。老人最爱听的是西方古典音乐，最爱看的是拳击和足球。遇上世界杯、欧洲杯足球决赛，他会如年轻人一样，半夜爬起来，看到天亮。

近两年，每到周六、周日晚上，电视节目就锁定江苏

卫视的《非诚勿扰》，从孟非、乐嘉，到台上走马灯似变换不停的男男女女，他一一点评，如数家珍，甚至插播广告的时间几分几秒，也了然于心，绝不耽误临时换台。朋友走了，他又在床上看书至深夜，从丘吉尔、吴法宪的回忆录，到宋人笔记……

这便是一位年近九旬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精神毫不萎靡，总是用好奇、开放、乐观、热情态度去拥抱生活，拥抱艺术。

老人看重的是文化创造带给自己的快乐、带给观者的愉悦。“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谈到人生时，他常爱引用俄罗斯诗人巴尔蒙特的这句诗。追逐太阳，对于他，就是永不停息的艺术创造、挥洒性情，享受阳光下生命的每一次快乐。

张充和：我都快100岁了，还忌讳什么？

一次，我有急事赶飞机，不料狂风暴雨，飞机一时不能起飞。同行者无不恼火，而我坐在拥挤的舱位当中就好像如坐针毡。习惯性地摸出手机，按响了充和姨妈的电话。这时候，正是傍晚6：40分。

我知道要等铃声响到第六下时，才可以听见姨妈的声音，这是因为充和姨妈是位99岁的老人，她总会自己一步一步走过去接电话。

当听到姨妈用平静和蔼的声音招呼我：“小东啊，有事吗？为什么喘吁吁的样子？”顿时，所有委屈、疲劳和焦躁都在充和姨妈关爱当中离我远去，我定了定神回答：“有些郁闷，想听听您讲话……”

“哦，我刚好在吃晚饭……”

“那我一会儿再打吧。”

“别，别，我只有最后两口啦，你已经打过来了，我们就随意讲讲吧。想知道我在吃什么吗？一盘大虾，一盘火腿，还有一盘豆角，两荤一素。”

我想到姨妈患有高血压，便小心翼翼地：“有一点不太健康，吃鱼比较好……”

姨妈在电话那头笑起来：“小东，我都快一百岁了，还忌讳什么？我现在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切随意。其实我一向注重随意，无论吃饭还是睡觉。我从来也不会规定时间去睡觉，睡得着就睡，睡不着就起来读读书，写写字。”

充和姨妈出生于1913年，风风雨雨近百年，一次又一次的战乱逃难当中走出来，个中痛苦不是用“随意”两个字可以包含的。记得在她70寿诞时书写的一副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不就是充和姨妈随意的人生哲学最真实的写照吗？

杨绛：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1997年钱媛去世，1998年钱钟书去世，可是杨绛当着外人一滴眼泪都没有，即使是最近的亲人也看不到。杨绛在文章中说“我们家”已经成了人生旅途的客栈，“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她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亲戚去看她都带着孙子孙女同往，她特别高兴，说她们把福气带给她了。

杨绛让亲戚们不要担心，她说自己“要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所以会留在人世间，不会“逃跑”。她的办法，就是一头把自己扎进书里，忘掉自己。她读了些古圣哲的书，最后选择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篇》，反复读了很多遍，最后决意翻译这篇对话。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灭，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信念而选择死亡，杨绛想借翻译自己不认识的希腊文，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每次看望前，亲戚和熟人都预先给保姆说好。不能去太早，因为杨先生要梳妆打扮。杨绛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旧的，可是特别有派，百岁老人还有她自己的气度。这种韧劲，在了解她的人看来，不是晚年养成的，而是天生的。

外文所的朱虹说，最佩服杨先生，是她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有尊严感的气派，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朱虹用“漂亮”来形容，说她的那种漂亮，不光是外表，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

不过这些外在的赞美，或者感叹，都和杨绛的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了。她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心理月刊》）

肖娟、李辉、章小东、王文，均为《心理月刊》编辑记者。

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

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

文 / 蒋方舟

大学4年，我听了无数次讲座和演讲。在所有这些演讲中，听众最多的，当然是那些创业成功者来做的演讲。

演讲结束之后，有3个问题被问得最多：“第一，你觉得你成功的最大因素是什么？第二，你的公司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第三，你们公司现在招人吗？麻烦给一个发简历的邮箱吧。”而最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以招聘和广告为目的的演讲，题目中一定包含着“梦想”两个字。

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梦想”这个词产生了怀疑。成为明星是梦想，成为冠军是梦想，答对5道题目打败4个人闯过3关也是梦想，甚至上电视3分钟就被速配了一个恋爱伴侣，晕晕乎乎地就牵手下台也属于“梦想”。

我们是多容易被词汇迷惑啊。自从有了“成功人士”这个称谓，我们对于“成功”的想象就是“白玉为堂金做马”；自从“梦想”这个词被滥用，它所指代的内容就是：有朝一日，“大鸣大放”，路人皆知。

1个月前我去台湾，在大街小巷宣传的，是一部台湾本土电影，叫作《世界第一麦方》，梗概是：作为主角的年轻人有着坎坷的童年，经过不断地打拚奋斗和经历挫折，终于成为世界面包冠军。

“做最好的厨子”，“开计程车也能有很棒的未来哦”，这是台湾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励志教育。说实话，我看了之后，那种“大国”的自豪感立刻就涌上心头，壮哉我大陆，台湾果然是个小地方，这种“不入流”的职业竟然也拿来宣传。

我去台湾见到一个报社的社长，他说他的儿子读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然后去哈佛读了经济学，又去

伯克利修了EMBA，等到全部的学位修完之后，他的儿子对他说：“爸，我该念的书都念完了，我不欠你的啦。现在，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了。”

按照我们的猜测，他儿子应该是去创业了才对，结果，那个年轻人现在成了一名很优秀的西餐厨师。我听完这个故事，忙不迭地对报社社长深表同情，他却非常诧异，他说自己非常为儿子感到自豪。

“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也能被称为梦想；高学历的年轻人去做饭，他的父亲很为这种选择骄傲……这种种的命题，我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能消化和理解，才承认：或许这些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我。

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不得不工作，他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不是出于热情，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可厌的工作、无趣的工作，仅仅因为待遇高于其他人而备受重视的工作——不管那项工作有多可厌、多无趣，这是人类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

一个彻底诚实的人，如同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内心只有一种声音。他人的劝诫、世俗的虚荣、生活的诱惑、权力的胁迫，这一切都无法入耳、入心。当一个人有所追寻时，他只会看到他所追寻的东西。

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这就是我每日对自己说的。（腾讯网《大家》专栏）

蒋方舟，中国青年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筷子拿得远的人

不论是人、是兽、是植物，当他们成熟，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声音、一种力量，说：“飞吧！愈远愈好。这是生物进化，当然的道理。”

文 / 刘墉

从 我记事，就常见母亲对那些拿筷子位置很高的女孩子说“将来准会嫁得远远的”这类话，既给女孩的父母听：“你们这女儿不中留，养大就飞了，而且飞得很远。”也说给女孩听：“将来嫁出去，只怕难得再见父母几面，能孝顺，赶快好好孝顺父母。”

母亲倒也有她的道理：“女孩筷子拿得远，表示从小就喜欢夹远处的菜，而且，拿得那么靠后面，手一定有力气，这种个性和力量，就让她能高飞。这年头，能高飞的没有不飞的。翅膀一硬，就非飞不可。”

读三毛的《闹学记》中陈伯父写的序言，说三毛出国时，大家去送，三毛居然直直地走向机舱，不曾回头。我吓一跳，心想：“将来我女儿大了，会不会也这样，突然想飞，就飞了？”

儿子最近已经让我有了这种感受。暑假前，我打电话去，对儿子说：“在学校好好练网球，回来可以做我的对手。”他停了两秒钟，居然淡淡地说：“爸爸！今年暑假我想在曼哈顿租间房子，住在外面。”

我愣住了，告诉妻，她也愣住了。告诉全家，全家都愣住了。结果，在全家无声的抗议下，他没去曼哈顿住，去了更远的北极圈。

我常想，每个人心中会不会有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推着我们离开家，而且离得愈远愈好。也记得自己在少年时代，读六朝乐府名家鲍照的传略，说他幼年时就有大志，认为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死守乡里，蕴藏了自己的智能，“使兰艾莫辨，终自碌碌无闻，其燕雀相随乎？”

曾看过一部报道北极狼群的影片。小狼诞生了，寸步不离地跟着母狼。长大些，则扑来咬去地跟妈妈玩耍。一家狼，温馨极了！渐渐地，小狼长成了大狼。有一天，在妈妈身边跑着跑着，突然跑离了家，跑不见了影子。母狼站在高处，看了看，转身，低着头回家。又过些时候，那“孩子”回来了，身边带了一群小狼，在“娘家”不远处，左边撒泡尿，右边撒泡尿，且在母狼走入它撒尿范围时，龇着牙，发出奇怪的吼声——表示，那是它的地盘、它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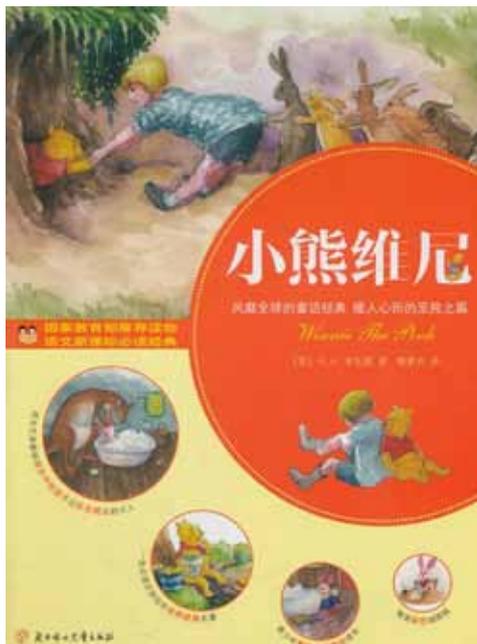
曾在植物学的书上读过，许多花朵虽然是雌雄同花，但当雄蕊成熟时，雌蕊还没成熟。而雌蕊开始分泌黏液，可以接受雄蕊花粉时，旁边的雄蕊却已经凋零了。据研究，只有这样“远交”，才能避免近亲繁殖，有优生的效果。

我常想起那站得高高的，张望着孩子远去背影的母狼，也想起三毛、撒哈拉和西藏纪念文成公主的大昭寺。不论是人、是兽、是植物，当他们成熟，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声音、一种力量，说：“飞吧！愈远愈好。这是生物进化，当然的道理。”

我也愈来愈佩服，那些小小年纪，就把筷子拿得很远的孩子。今天，他们站起来，伸着胳膊，在一桌大人的注视下，夹起离他最远的一大块肉。明天，他会站起身、甩甩头发，在一群亲友的注视下，走向机舱，走向他向往的世界。（《跨世纪（时文博览）》）

刘墉，知名华人作家、画家，被称为“沟通青少年心灵的专业作家”。

本期推荐



《小熊维尼》

(英) 米尔恩 著, 穆紫衣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1-7-1

内容简介

“我叫噗噗，别人管我叫维尼。我是只没什么脑子的笨熊，傻气直冒；我爱蜂蜜，爱朋友，爱玩噗棍游戏；我是发现北极的大英雄呢。喏，我的家在百亩林深处。邀请你来作客！记得哦！风靡全球八十多载 献给全世界青年人和儿童的礼物。

英国儿童文学家米恩为自己儿子所写的这个系列故事，取材自儿童身边的布偶和以小熊维尼为主的周围各种动物，他们彼此间的友情、爱、勇气，以及充满乐趣的生活。

他经常自嘲“没脑子”，却总是主意新奇；他最喜欢贪吃蜂蜜，却也时刻关注朋友所需；他时不时犯点小傻，可伙伴们还是喜欢他；他已经86岁“高龄”，却依然活跃在全世界小朋友的心里——他就是小熊维尼。他和男孩罗宾，小猪、小兔、小灰驴还有袋鼠一家快乐地生活在百亩森林里，他们性格各异却都天真无邪，生活简单但始终相依。他们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梦，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

作者简介

A.A. 米尔恩 (A.A. Milne, 1882-1956) 英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童话作家和诗人。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大学读的是数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过英国老牌幽默杂志《笨拙》的副主编。在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之前，他已经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但真正令他闻名世界的，还是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米尔恩的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四部：童话《小熊维尼》(1926)和《小熊维尼角的房子》(1928)，儿童诗《当我们很小的时候》(1924)和《现在我六岁了》(1927)。

自1925年第一次出现在《伦敦晚报》上起，《小熊维尼》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风风雨雨，时至今日，它依旧魅力不减，全球30多种语言的译本以及7000万本的销量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迪斯尼的动画片中，穿上红衣服的维尼创造了59亿美元的财富，因此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卡通形象之一。



书评

对 孩子们来说，什么样世界、什么样的事情是最快乐的呢？小熊维尼喜欢吃蜂蜜，但在吃之前的那一瞬间比真正

吃的时候感觉还要美妙，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跟克里斯多夫·罗宾在一起非常好，而跟小猪做邻居也是不错。

这就是孩子们的理想天堂：有喜欢的食物，有好朋友，还有美好的环境，多么完美。当然还有那只很小的猪，可以轻松钻进衣袋里被带到学校里去，

“当你不知道七的两倍等于十二、还是二十二时，摸摸口袋里的小猪会觉得很安慰”，这就是孩子们想要的。而米尔恩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完全懂得孩子们的心思，并且同他们站在一起的讲故事人，他用故事为孩子创造了一个有趣的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被描绘成非常完美的样子，在百亩林里，也会下很大的雨，一直下到把小猪的家都淹没了；也会刮很大的风，一直刮到把猫头鹰的家都吹落了下来；可是大多数时候，它是简单、安宁而美好的，尤其是当罗宾、小熊和小猪一起坐在桥上，“静静地看着身下的河水缓缓流淌，好长时间没说话。

就是这样，即便出现了挺恼人的恶作剧，最后都能够轻松化解，百亩林中不会发生小王子与玫瑰花之间的那种紧张情形，也不会闹出太大的别扭来，当然更加不会因此而分离。因为没有人真的计较，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人真的有什么不对的想法。这是给孩子们讲故事时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它会告诉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爸爸妈妈所期待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孩子，而是一个快乐的、真实的、最重要是好心的孩子，就像故事里的小熊维尼总是做傻事，但是大家都很喜欢他，而兔子瑞比有时候也弄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过他的本心跟大家一样，都是很好的。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世界，与《小王子》世界里那种悲凉的基调完全不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都洋溢着一种乐观的、积极的情绪。这是给孩子们讲故事时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能够呵护孩子们自然、淳朴的天性，不仅让他们的生活充满欢笑，更使他们有信心去面对周围的世界，相信只要自己在努力，大多数事情都能够获得解决——至于那些暂时无法解决的事情，比方长单词的拼读问题，也不会因此就让我们生活看不到希望啊。更何况，所有的故事并不一定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好多时候它甚至可以只是：

“哦，小熊！”罗宾说道，“我好爱你。”

“我也一样。”维尼说道。

——摘自红土《他给了儿子一个美好的世界》



小熊维尼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里，一天，小熊维尼到外面去散步，他来到了森林中间的一块空地边上，听见了一阵阵嗡嗡的声音。

小熊维尼把手放在他的腮帮子上，开始思考起来：“哎呀，这究竟是谁的声音呢？”过了一会儿，声音越来越大了，小熊抬头一看，原来这声音是从一棵大橡树上传来的。

他开始自言自语起来：“对了，一定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有嗡嗡的噪声呢？我一定要好好想想，是什么东西发出的这种声音。啊哈，我想起来了，一定是蜜蜂。”

接着，他又在橡树下自言自语了好一阵子：“我听说，蜜蜂一辈子都在酿蜜，他们真是不简单呢。”

这时小熊维尼站了起来，他好像已经想明白了，“对呀，我知道了，蜜蜂活着是为了酿蜜，而蜜蜂酿蜜就是为了我，小熊，能吃到甜甜的蜂蜜呀。”小熊一边想，一边说，一边说，一边想，就开始爬那棵大橡树了。

小熊太笨了，爬了大半天才爬了一小段儿。一小段，一小段，又一小段，小熊越爬越高了。小熊维尼终于爬到了树梢，站起来就能够得到蜂房了。可是，就在这时，“咔嚓！”一声，树梢断了。

“啊，救命啊！”小熊叫了起来，只见他从他刚爬上去的那根树枝上掉了下来。

小熊被弹到了第二根树枝上，他还一边说：“哎，要是没有——”小熊还没有说完，又被弹到了第三根树枝上，接着是第四、第五、第六根树枝上，当他从第六根树枝上向下滑时，小熊终于认识到情况实在是太不妙了。“哎呀，救命呀！”小熊从最后一根树枝上掉了下来，在空中还翻滚了好几次，才以优美的姿势滚进了灌木丛里。

小熊从地上爬了起来，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哎，我是怎么搞的呀？”小熊又开始思考起来，“我该怎么办呢？”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的好朋友，男孩儿克利斯托夫·罗宾。

于是，维尼就去找罗宾了，罗宾住在森林的另一头。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罗宾带上了枪，同小熊维尼一起出发了。

经过一块泥泞的洼地时，维尼在里面打了几个滚，出来以后成了一个黑鬼，看不见原来的模样了。然后他们来到了大橡树下，罗宾把气球吹到了最大，“好了，维尼。”

“克利斯托夫·罗宾，我呀，我——我，我觉得这些蜜蜂很聪明，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我是一朵小乌云呀。”

——选自《小熊维尼》